



“四季美”创始于1922年，被誉为“汤包大王”，2011年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20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汪玉霞”创始于1739年，是武汉历史最为悠久的食品老字号，2015年被认定为“湖北老字号”，2021年荣获中国食品行业百年传承品牌。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萌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姚四平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许濛

编辑：严濂 郑雅飞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 4 “四季美”绽放时代之美 / 张德隽
- 8 “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 / 熊年顺(口述) 熊琪明(整理)

三镇拾遗

- 14 “怕上春风六度桥”——“六渡桥”本名“六度桥”
/ 冯天瑜
- 16 汉口岳飞街3号“浮现”徐源泉公馆 / 刘汉桥 田联申

往事漫忆

- 19 回忆武汉海外统战工作的发端和拓展
/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

山有赏门

- 24 开沉师为我“站台”记 / 涂文学

目录

CONTENTS

委员天地

- 29 履职十五年,为百姓“算账”/周永先
33 在汉再续“从政”生涯/魏启响(口述) 郑雅飞(整理)

高聚汉皋

- 37 我从水乡走来/蒋喜(口述) 严濂(整理)
42 自强不息方显生命本色/柯于亮(口述) 谢定(整理)

精工匠心

- 46 我要认真修好每一列地铁列车
/张兵(口述) 白爱萍(整理)

都市史话

- 50 和利冰厂与汉口城区的演进/侯红志

史海钩沉

- 55 对乾隆钦定“盘龙城”的史实梳理/裴高才
61 湖北模范监狱幸存武船老厂区/韩少斌 罗时汉

主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刷:武汉市仁达印刷厂

出版日期:每月28日

定价:8元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46号

邮编:430010

电话:(027)82220669(传真)

E-mail:whzxwzsl@163.com

开栏小语：武汉作为享誉全球的重要商埠与历史文化名城，老字号如雨后春笋连绵不绝，构筑三镇繁华，挽住两江风流，积淀为宝贵的商业文化，树立起独特的城市品牌，承载着“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

历经岁月淘洗，焕发时尚青春，共有61家老字号跻身中华（13家）、湖北（15家）、武汉（33家）三级行列。这些老字号，遍及餐饮、食品、照相、理发、钟表、眼镜、乐器、古玩、百货、中药和纺织等行业，营业网点近800家，植根市民记忆，服务社会发展，营造出浓郁的本土市井气息，成为外地游客的“网红打卡地”。

为开掘这一丰厚资源，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本刊在市商务局的大力支持下，开设“老字号脉”专栏，“脉”为之追寻人文之源，“号”为之探索振兴之道，彰显历史价值，传承创新精神，助力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四季美”绽放时代之美

◇ 张德隽

【老字号小档案】

“四季美”创始于1922年，原址在汉口后花楼交通路居巷口，主营小笼汤包。在苏式汤包的传统基础上，按照武汉人口味，逐步改进为汉派口味汤包。由于选料严格，制馅讲究，被誉为“汤包大王”。

1956年，“四季美”实行公私合营，营业规模、服务设施、品种风味都有了很大飞跃。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期间，毛泽东、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品尝“四季美”汤包后，给予赞扬。

1983年，“四季美”继往开来迈向新征程，致力于把金字招牌发扬光大。1987年，申请

中国首项速冻汤包专利。2001年，徐家莹成为湖北省唯一白案“中国烹饪大师”。

“四季美”2004年成为中国首部小吃标准的主要制订者，2011年由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2020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

如今，“四季美”成立了品牌有限责任公司，在盘龙城投资数千万元建立十万级净化的中央厨房配送系统，并将扩展加盟门店，以敞亮的店堂、丰富的品种，更好地为广大市民和旅客消费者服务。

汉口地处华中腹地，位于长江中下游与汉水交汇处，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水运之利，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特别是汉口开埠之后，江浙一带涌入的生意人猛增，汤包也由扬州、镇江等地流传到汉口。

1922年，汉阳人田玉山瞅准商机，在后花楼交通路居巷口开办小吃店，不久主营小笼汤包，招牌先叫“美美园”，后称“四季美”。

1956年公私合营后，“四季美”在中山大道江汉路口另择门面，竖起四层的小高楼，发展成为大型餐馆，更加声名远扬。

历经四代传承人的不懈追求，“四季美”汤包作为“非遗技艺”，百年重拾老味道，与时俱进新发展。

徐大宽、钟生楚推进风味“武汉化”

第一代传人徐大宽，奠定了“四季美”汤包的发展方向。

汤包本是下江风味，偏甜，一般作为甜点食用。“四季美”初始，聘请南京的汤包师傅徐大宽掌厨，他迎合武汉地区重油偏咸的饮食习惯，大胆对汤包进行了一些改良。

徐大宽注重选料，一概用上等新鲜原料，同时对制作过程中的熬皮冻、制肉馅、制包成形、上笼火候等程序严格把关。经过推陈出新，汤包肉馅香嫩、汤汁鲜美，更贴近江城市民的口味需求，吸引了众多顾客慕名前来，“四季美”一时名声大噪。

第二代传人钟生楚，在苏式汤包传统基础上接力改进，形成“下江风味武汉化”的小笼汤包。

一是在面皮制作上讲究，加大咸味比



中国烹饪大师徐家莹在制作汤包

重，采用子面兑酵面形成的面团，制作汤包外皮更有韧性；二是在制馅上考究，在肉馅和皮冻比例中加大后者比重，增加汤汁更为饱满；三是在制包成形技术上追求精致，改变苏式传统的封口汤包，制作出外形似鲫鱼嘴的汤包，尤其对制作过程的三大环节——叠（送叠，俗称摔球）、捏（捏花纹数18—21片）、收（最后两片收口处聚拢捏紧）一丝不苟。因此，新型汤包具有皮薄、汤多、馅嫩、味鲜的独到特色。

此外，根据节令应时推出蟹黄汤包、虾仁汤包、香菇汤包、鸡茸汤包和什锦汤包等，受到顾客的好评，钟生楚也被誉为“汤包大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及朝鲜金日成首相等外国贵宾，多次品味钟生楚制作的汤包，给予很高评价。1958



四季美的传承与匠心

年4月3日，钟生楚在汉口老通城支店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1978年，他被湖北省政府授予“特级厨师”称号。

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钟生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熬皮冻、制肉馅、制包成形熟稔于心，制作出外形花细均匀、呈鲫鱼嘴形、内馅微露等特点的汤包。由此，他总结出汤包制作的技术要点——“面熟碱准水适当，节准量足个一样，边薄中厚擀圆形，馅子挑在皮中心，花细均匀鲫鱼嘴，轻拿轻放要摆正，火候时间掌握准”，逐渐形成了汤包的制作标准，保证了质量的稳定性。

徐家莹多重创新推出“汤包宴”

1983年，钟生楚的关门弟子徐家莹，出任“四季美”总经理。此时，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一大批“老字号”失去往日的辉煌，甚至面临消亡的危机，“四季美”也处于艰难时刻。

徐家莹始终把产品创新摆在核心位置，坚持深入生产一线，一面收徒亲力亲为传授汤包传统技艺，一面摸索总结经验开发汤包新品种。将过去单一的鲜肉汤包，发展为三鲜、虾仁、蟹黄、香菇、鱿鱼、海参、甲鱼、

香菇等多个品种，每日挂牌12大系列、18个花样、8种味型，形成高、中、低三个价格档次，以其多品、多馅、多味、多型的特色，满足了不同口味、不同消费能力的需求，广受中外顾客的好评。

在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店堂装修上档次的基础上，徐家莹顺理成章推出新招——广聘名厨掌勺，开设特色汤包筵席。何谓汤包筵席？

就是让汤包唱主角，相关菜品唱配角的百味“汤包宴”，以一笼汤包配一道菜的形式（例如鸡茸汤包就用鸡做一道菜），琳琅满目呈现全新面貌。

1986年，徐家莹和师傅们一起，将鲜、咸、甜、麻、苦、辣、怪、酸八种味感和花、鸟、鱼、虫器皿汇聚一桌，品种齐全，花色各样，应有尽有，尝不胜尝。这一经营业态富有开拓性，很快使顾客获得新鲜感受：一桌“汤包宴”满足了一举两得的好口福，既能吃到不少于12种花样的汤包，又能品尝南北菜肴的风味。据消费调查显示，顾客普遍认为这是“四季美”经营套路的历史性突破。

徐家莹不断开拓思路，调整产品结构，研制出一种既能持久保鲜，又能方便携带的速冻汤包，从而使顾客在家也可享用地道的“四季美”风味。1992年，速冻香菇汤包申报专利，获得专利产品称号。

徐家莹改善物质匮乏年代汤汁油腻的配方，并在产品搭配上增加解腻功能，兼营八宝粥、糊米酒、紫菜汤、花茶等甜食饮品，适应了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新变化。

徐家莹从未停止过创新，她和同事们一起研制、推出的特色系列汤包品种达120多个，其中8种成为省、市名优产品，3种获得全国金奖。

第四代传人继往开来创立“旗舰店”

由于城市地铁修建和新潮小吃兴起，“四季美”同众多老字号一样，遇到了严重挑战。

2017年，我作为“四季美”第四代传承人和徐家莹的儿子，不甘“四季美”沉寂数年，勇挑总经理重担，母亲则退居“幕后”支持。

2017年，在吉庆街租下三层楼铺面，作为“四季美”旗舰店正式营业。以往，由于速冻技术瓶颈没有突破，新鲜汤包冰冻需要花上一两个小时，“四季美”中央厨房制作的速冻汤包只够供给七家店面使用。2018年，“四季美”委托厂商研发出零下80℃的速冻柜，可以在20分钟内快速冻住汤包，锁住汤包的原味和鲜味，解决了速冻汤包的供应量问题。

目前，“四季美”在武汉三镇布点十二家，位于吉庆街、汉口里、万松园、武广、百步亭、户部巷、黄鹤楼、东湖、光谷等地。我积极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资源，拓展生存发展空间，从“四季美”三字招牌出发，推出相应产品，让武汉市民能在家门口品尝到传统美味。

为此，“四季美”奋发有为，书写新的华章。

企业营销多样化。开辟品牌传播途径，线上、线下媒体平台齐头并进。线上，武汉电视台拍摄播放汤包制作、经营视频，地铁2号线、4号线免费循环播放宣传视频。线下，每周在吉庆街店举办四到六场“非遗研学会”，与学校或第三方机构合作，每场10多名小学生参与，一起分享武汉城市历史、“四季美”文化和非遗技艺，实地体验包汤

包的乐趣，在年轻家长圈和小学生圈扩大了知名度。

工艺流程标准化。“四季美”汤包都由师傅纯手工精心制作而成，不同于机器制作，外形会出现细微差别。因此，在遵从非遗技艺制作标准的前提下，选出制作符合标准的专员，配备在每一个门店和加工厂，对员工进行培训和指导，保证都能制作出标准的汤包。每季度师傅评级时，外形和速度双重达标才可以晋级。

队伍打造常态化。目前“四季美”掌握汤包技艺的师傅有65位，其中15位在吉庆街店制作新鲜汤包，30位在中央厨房制作速冻汤包，每季度进行季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评级，成绩不理想者“回火”培训，由此改变单一的师徒传承模式，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后继者。

从徐大宽、钟生楚到母亲和我，“四季美”汤包技艺的传承方式，完全依靠师徒传承，往往前三年在店里打杂磨心性，三年后才会从和面、揉面、擀面皮等步骤学习汤包技艺，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掌握技艺更深刻，因而更具创新能力，一般终身不会改行。

纵观“四季美”的传承与发展，我强烈感受到，要让“四季美”在市场竞争大潮中经受住冲刷，必须紧跟时代脚步，再次焕发青春，打造其独特的非遗文化特色，提高品牌信誉度，增强同快餐文化竞争的能力，迸发新的生机活力。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们“四季美”积淀深厚，愿不断凝萃文化之光，默默绽放时代之美。

张德隽，武汉市四季美饮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

◇ 熊年顺（口述） 熊琪明（整理）

【老字号小档案】

“汪玉霞”创始于1739年，由安徽茶商汪士良携如夫人蔡玉霞在汉正街823号灯笼巷创办食品杂货店，经营茶叶和糕点等，因蔡玉霞掌中有朱砂被誉旺夫，取名“汪玉霞”，是武汉历史最为悠久的食品老字号，迄今已283年。

“汪玉霞”鼎盛时期，店铺开满武汉三镇，但因年年战火，临近武汉解放时仅剩三家。

1956年公私合营并注册“玉”字商标生产传统中式糕点，先后更名向阳食品厂、新华食品厂，1983年恢复为“汪玉霞”。1985年花楼街老厂房重建，生产量大幅提高，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食品生产厂家之

一。1993年引入日本先进设备后，进一步提高产能，每季月饼生产达1000吨，年利润800万元。

2003年为保护品牌，注册“汪玉霞”商标。2015年公司调整生产经营模式，恢复“前店后厂”，在汉口园博园开设第一家旗舰店，经营取得很大成功。2016年在吉庆街开设第二家，让“汪玉霞”品牌重回老武汉市场。

“汪玉霞”2016年被湖北省商务厅认定为“湖北老字号”，2021年被授予中国食品行业百年传承品牌，2021年4月12日代表武汉市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全球推介会，其送选产品获得好评。

“汪玉霞的饼子——绝酥（劫数）”，是所有老武汉人都能脱口而出的一句谚语。对于“劫数”的解读，有人从词语本义理解为“命中注定的厄运”，有人认为应该是“接受”的谐音，也有人考据应该为武汉方言中夫妻之间的别称，相当于北方官话中的“冤家”。到底哪种解读是正确的，并无定论，但“汪玉霞”这一品牌在老武汉人心中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

我1980年进入“汪玉霞”（当时称“新华食品厂”）当工人，一路成长直到2018年担任公司经理，深受老字号文化的熏陶，也秉持着“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

“汪玉霞”成了汪家的“旗舰店”

元代以来，汉口只是汉阳府下辖汉阳县的属地，在明成化年间汉江改道后，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作为水运码头迅速发展为市镇，盐运和粮运造就了繁荣的汉口港。

明末清初时，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商业流通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品生产的地理优势，汉口逐渐成为我国腹地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商品生产地，有“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之说，产品甚至能远销欧洲。

自清中叶起，来汉口经商的徽州商团越来越多，逐渐形成汉口市场上的一股强大势力。盐业、茶业、米粮、典当，都是徽商占据优势的领域。1739年，清高宗乾隆四年，汉正街灯笼巷口（汉正街823号），安徽茶商汪士良给自己的“如夫人”（有一定地位的妾）蔡玉霞的一家小店注资，店名“汪玉霞”。

一开始，“汪玉霞”的经营项目跟本



80年代之前的车间

家一样，只卖安徽茶叶。由于为人诚恳，货真价实，生意渐有起色，又额外销售些藕粉、葛根粉等食品。红颜薄命，蔡玉霞在1741年不幸撒手人寰。小店几经周转，后传入汪士良的长孙汪国柱手中。

1770年，白莲教又一次起义，长江航运封锁，没有门路的普通商人遭遇灭顶之灾，但汪国柱从担任九江关关督的祖父旧友那里拿到了“短暂解封”的内部消息。他在汉口低价收购了1.5万吨桐油，趁几天后短暂的解封期，将其运往桐油短缺的江浙一带，赚取暴利。

之后，汪国柱从安徽回到汉口，开设当铺36家、衣庄72个、食品油号（包括桐油及各类生产资料）28个，总计136个门面，同时在安徽老家置田产百亩。当时有一种说法，汪家人从武汉往返安徽不用住店，因为沿途都是自家的店铺。

这一时期的“汪玉霞”，本小利微，其经营情况对汪家无足轻重。可汪国柱非但没有放弃这份祖产，每到年关还要请136个店铺掌柜到“汪玉霞”来吃团圆饭，座次以赚钱多少依次排列，谁赚钱最多谁坐

首席。小小“汪玉霞”，俨然成了汪家的“旗舰店”。

“汪玉霞”一直留在长房手中

自19世纪中叶起，全国的徽商都开始走向没落，其原因包括道光的盐业改革、湖南湖北的茶叶生产兴起、开埠后全球贸易带来的“降维打击”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武汉成为了徽商最后的阵地，许多商人利用武汉的贸易优势，及时转型，保住了一丝血脉。

“汪玉霞”正是如此。

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吸食鸦片增多，因口里发苦无味而喜甜食，食品行业尤其是糕点行业的生意由此火了起来。“汪玉霞”开始由贩卖糕点转型为兴办小型手工业食品作坊，雇工生产酥糖、碱酥饼、杂粮、芝麻糕、绿豆糕、酥京果等食品，店铺后设厂房制作，前面迎街门脸作为铺面销售，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

汪国柱去世后，汪家产业逐渐衰败，只剩下了十家铺面，分属五房。“汪玉霞”一直留在长房手中。当时，来店里谈生意的商人客户，都喜欢点上一份糕点，泡上一壶茶。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逐渐加深，眼见茶叶、桐油的生意越来越做不下去，“汪玉霞”的经营方向，索性就彻底改为了甜品糕点。每逢端午佳节，手巧艺精的师傅们就制作美食糕点——绿豆糕。其传统工艺技术考究，蒸熟后金碧晶莹，入口清香甜美，风味独特，既是一味适合时令的可口药膳糕点，又是武汉饮食文化独创的一种营养丰富的美食，堪称是武汉老字号美食的佼佼者。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绿豆磨之为面、澄滤取粉，作饵炖糕……有解诸

热、补益气、调五脏，安精神，厚肠胃之功。”古往今来，武汉人就有用绿豆作饵炖糕的悠久历史，其制作方法是：绿豆用清水浸漂，清洗干净、脱去豆衣、蒸熟晒干，研磨成粉，添加绵砂糖和猪油充分搅拌均匀，倒放在糕砧板上，反复掺和揉制成糕泥状，再用家传木雕“福”“禄”“寿”或“寿桃”“菊花”“双石榴”等图样花纹的糕印，在压印过程中加入豆沙，成型后蒸熟就成为清香扑鼻，入口软滑清的绿豆糕。

“汪玉霞”进入两店并存时期

1858年，灯笼巷的老店毁于战火，随后迁至汉正街由义坊（汉正街815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阳夏战争中冯国璋火烧汉口，由义坊的店面也被烧毁。1920年，汪家第六代传人汪启檬变卖安徽老家田宅，在上花楼街重开门面，取名“汪玉霞雨记”。汪家第七代传人汪子泉通过贷款筹得资金，在下花楼街（原花楼街218号）重开门面，取名“汪玉霞为记”。至此，汪玉霞进入了两店并存的时期。

“雨记”“为记”皆为汪玉霞嫡系传人，生产经营的品种、风味、工艺大体相同，竞争在所难免。不过，“雨”“为”两号都深知汪玉霞的品牌价值，对恶性竞争都心存顾虑。因此，两号签定了一个市场划分协议，规定两家若再开设分店，都不得使用“汪玉霞”的招牌；而且以六渡桥为界，分别在上下段开设分店。此后，“雨记”在上花楼街洪益巷口开设汪玉美食品杂货店，“为记”在中山大道生成里口开设汪玉成食品店，都是循此例开办。

在良性竞争之下，汪玉霞“雨”“为”两号经营稳步发展，业绩甚佳，其产品的市

市场占有率、信誉度及营业额，都驾乎同仁之上，双峰对峙，名噪三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对武汉狂轰滥炸，使得无数百姓遭殃，民族工商业也大受影响。

武汉沦陷前夕，雨记“为记”被迫停止营业，资方和职工分别外避到汉阳等乡下。但逃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无奈，只得又回到沦陷于日寇之手的武汉，以图恢复营业。“雨记”由汪家第九代传人汪少峰主持业务，而“为记”情况不妙，房屋被日寇霸占为仓库，不许进店。1938年下半年，汪家传人集资在交通路开了一家“汪玉霞合记食品杂货店”，有12名职工，营业情况逐渐恢复，各股东信心高涨。1945年抗战胜利，临时合股的“合记”拆伙歇业，“汪玉霞”又恢复到两号并行发展的局面。

1956年，“雨记”“为记”实行公私合营，此后又走向国营，厂名分别改为“向阳食品厂”“新华食品厂”。鉴于“汪玉霞”品牌的悠久历史和广泛影响，“新华食品厂”在1983年又恢复为“汪玉霞食品厂”，并登记注册了“玉”字商标。

1994年，“汪玉霞”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部评为“中华老字号”，是当时湖北省食品企业中唯一获此殊荣的单位。多种特色产品，也在商务部的评选中获奖无数。然而，荣誉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

“汪玉霞”鼎盛在1990年前后

我1964年出生，1980年初中毕业后，因集体土地被武汉市副食品公司征用，分配到新华食品厂。

初始阶段，我在车间任杂工，深感文化程度不足，1983年到市商业学校进修企

业管理。1985年回厂后进入技术科，负责厂里的标准制定工作，后来厂里的大部分技术标准都出自自我手。

“汪玉霞”的鼎盛时期，在1989年至1993年，那时仅中秋节前后一个月时间，销售额就高达800多万元，纯利润300多万元。此间人手不够用，还要临时聘请200多个临时工，临时工一个月的工资都能拿到2000多元。产品供不应求，连外省市来买月饼，都要提前一天到才能拿到货。在武汉，“汪玉霞”月饼的销售额长年排名第一，一直是武汉市场上的“老大”。

1993年，顺应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中外合资潮流，“汪玉霞”与一港商合资成立玉兴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薯片及其他膨化食品。港商仅提供了一套真空油炸食品制作设备，而“汪玉霞”不仅提供全部资金，还将原本五层楼的生产车间让出两层给“玉兴”，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拨了一批过去。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港商提供的韩国设备不仅陈旧，而且其110V的电路设计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导致产品长期质量不过关，完全没有销路。不到一年，“玉兴”就倒闭了。这一决策导致“汪玉霞”亏损了几百万。我参观过“玉兴”的生产车间：“一开始蛮热闹，后来就熄了火。”

1995年，“陆氏（蛇口）集团”在中山大道与江汉路交界处修建佳丽广场，“汪玉霞”因在配套工程范围内，1995年10月与拆迁方签订了协议书：三年后原址还建其4600 m²的房产，每年过渡费按50万元/年计算。

此时的“汪玉霞”隶属于武汉市糖业烟酒公司，由公司安排租借另一家下属单位汉阳食品厂的厂房，利用剩余的部分设备

继续生产。此间，我被安排在家“休息”，后来因大量生产及管理人员流失，遂又被叫回来上班。虽然此时仍有近30万斤的月饼产量，但与1991年的300万斤相比不到10%，仅能勉强维持工厂的运转。管理上的漏洞并未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当时的业务员（专业销售人员）蛮邪，把厂里的优质产品拿出去卖掉，再低价购入小作坊的劣质产品退回。”由于无力支付每年30万元的房租，1998年“汪玉霞”只得从汉阳食品厂搬走。

三年还建期限已到，拆迁公司不仅未按原协议还建厂房，甚至连拆迁款都未能支付，只是象征性地支付了一些过渡费。“汪玉霞”只好搬到武汉蜜饯厂（汉阳十里铺）。然而，连续的迁移中，价值数百万的设备渐渐成了一堆废铁，勉强维持到1999年，“汪玉霞”不得不全面停产。

为保老字号“生产自救”

2003年，停产多年的“汪玉霞”被划归江汉区国资局，区里垫资改制，评估资产状况为“零”，由区经贸委托管，由企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事行政管理，恒运物业公司负责资产、财务管理等工作。

实际上，此时“汪玉霞”只留下年龄40岁以上（女）或年龄50岁以上（男）的员工，其余的303名职工全都买断下岗了。为了处理一些纠纷，公司决定留下11人的营运维持班子，在汉口球场街解放南路123号继续办公。这个办公地点属于“卓娅副食”，因亏欠“汪玉霞”货款，遂以租金抵货款，将此地租给“汪玉霞”。

“汪玉霞”此前从花楼街迁出时，为谋求发展，曾向社会公开集资，当时长航、

武药（武汉远大制药集团简称）等单位都曾注资，不过这笔投入并没有得到回报。多年后，汪家第十代传人汪宇代表武药方面向“汪玉霞”讨债，他四处找寻，才在解放南路一个小仓库，看到挂着简陋牌子的“汪玉霞食品厂”。汪宇说，当时面对此情此景，他只有伤痛的感觉。在因债务对簿公堂时，我代表公司出庭承诺：“只要我还在，这个牌子就不会倒。”汪宇非常感动，与公司协商后放弃了这笔债务。

为了保住老字号品牌，同时解决职工生活问题，2000年8月，“汪玉霞”开始支持职工“生产自救”，向20余“自救小组”提供有效证件。为尽量保证产品质量，产品统统冠以“汪玉霞”的“玉”字牌，希望通过市场上“汪玉霞”产品的回归，提醒人们记住这个老字号，这对于当时的“汪玉霞”而言，可能是“唯一的也是最为无奈的选择”。

2002年12月的报表显示，“汪玉霞”负债总额高达2149万元，净资产额为-1692万元，已是资不抵债。而销售收入、利润总额一栏则写着“0”。“汪玉霞”的全部收入，就是每年靠地处汉正街的两处房屋出租获得的12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支付职工的社保费以及伤、病、残、留守人员生活补助费和工资。“汪玉霞”早已徒有盛名。

随着公司管理权威的涣散及市场竞争逐渐激烈，部分“自救小组”未能自始至终履行约定，导致市场上的“玉”字牌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且定价混乱。

2003年5月31日，《楚天金报》刊出了一则不起眼的小广告：“由于厂房拆迁，我公司端午节期间不生产绿豆糕、芝麻糕等节令产品，也不委托其他任何厂家生产。市场上所销售的汪玉霞‘玉’字牌端午节节令



汪玉霞产品出现于外交部湖北全球特别推介活动

产品均为伪劣假冒产品——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工业公司。”

开设品牌专营店“涅槃重生”

2005年，在企业服务中心的安排下，营运维持班子搬到北湖西路54号统一办公，我开始担任公司生产主管，2013年任副经理，2018年任经理至今。

为了减轻国有机构的财政负担，恢复国有资产活力。2013年，“汪玉霞”同四家有资质的“自救小组”重新签订生产合约。有的小组主要负责向商超供货，有的小组走亲民的低端路线。这也是“自救小组”仅存的四家，其余的不是因为自觉前途渺茫而改行，就是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

2015年9月，借武汉园博园开园之机，我与实力较强的天怡食品公司牵线搭桥，经多方协调后，在园博园汉口里开设了第一家“汪玉霞”品牌专营店。2016年12月，又

借中山大道全面改造之际，在吉庆民俗街开设了“汪记婚庆文化体验馆”和第一家品牌专营店。后来，相继在百步亭及钟家村开设了两家品牌专营店。

一时，门庭若市，摩肩接踵，市民找回了传统的味道。线上线下销售也同步开展，使产值由不足700万元增长至4000余万元，并提供百余名就业岗位。

武汉“战疫”期间，“汪玉霞”肩负起社会责任，无偿捐赠50多万元的产品回报社会。2021年4月，在

外交部全球推介会——湖北武汉专场，“汪玉霞”的“玉”字产品昂首走进外交部蓝色大厅。

由于“汪玉霞”人的坚持与担当，中华老字号的“玉”字产品，在涅槃重生后成为英雄武汉的文化地理标志之一。“汪玉霞”品牌专营店的成功，也点燃了中式糕点复兴的火花，中式糕点品牌百花齐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色添彩。

熊年顺，武汉市汪玉霞食品工业公司经理、法人代表；熊琪明，新疆博州精河县高级中学支教教师

“怕上春风六度桥”

——“六渡桥”本名“六度桥”

◇ 冯天瑜

编者按：为全面展示城市厚重历史文化，本刊今起开设“三镇拾遗”专栏，深入发掘散见于武汉三镇的文物、典藏、遗址、史迹、人物、风俗等人文资源，探寻未经深入求证或充分认知的史实，力争有新发现、新补遗、新订正。著名文化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先生，以此文为专栏开篇。

记得在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为我治病的一位医生，曾就汉口六渡桥消失询问于吾。答曰：所询事，不熟悉，只能浅议一二。六渡桥确乎是昔日汉口繁华的聚焦处，那首冯翔的民谣《六渡桥》尽写老武汉人对她的眷恋：“屋里住倒王家巷，在一中上的中学，每天弯到六渡桥……六渡桥不见了，六渡桥不见了……”

“六渡桥”一名，出自清道光二年（1822年）范锴著《汉口丛谈》，内引述《汉口竹枝词》“怕上春风六度桥”之句。《汉口丛谈》对当时汉口“坊市街衢”，“大略纪之”。书中所列之“桥”分门别类，桥名多达三十个。这些桥名有的是吉利一类的，如多福桥、万寿桥；有的是风景一类的，如卧龙桥、飞虹桥；有的是姓氏类的，如赵家桥、燕家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范锴对“六度桥”特地引述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刊印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诗云：“妾似垂丝牵不断，郎如飞絮任斜飘，人都说是伤心树，怕上春风六度桥。”

关于“六度桥”的得名，坊间传说纷纭，实乃该地有一尼姑庵——“六度庵”也。六度庵庵名，在《汉口竹枝词》“灾异”卷中也出现过，叶调元在一首诗中自注：“自



汉口老地图明确标有六度庵

上堤自在庵至下堤六度庵、会馆约十余所，雕墙好宇，悉付风涛，神像落水，以绳系之。”“六度”是佛教语（所谓六度轮回），六度桥并非指桥梁，而是“渡彼岸”之意。后谐音，流转为“六渡桥”。

其实，清末民国此处成商业中心，既无渡桥，也无街道天桥。我1964—1979年间在汉口工作，每周过江回家必经六渡桥，从未见过有桥。这里的人行天桥1985年方建。

六渡桥一带确乎繁华，百货大楼、四季美、蔡林记、民众乐园会聚于斯，人称“过汉口”，首指“去（武汉人读“客”音）六渡桥”。武汉人对其深深怀念便理所当然了。

自2014年启动轨道交通一期工程始，中山大道大拆迁，具有象征意义的天桥首当

其冲，颇有特色的里分几乎扫荡以尽，至于昔日汇演百戏的民众乐园，则变成了硕大的杂货铺……我已多年未去汉口六渡桥一带，不知现状如何。

一个城市总应自有特色，不可千城一面，总是需要保存历史的韵致，给人留下一点乡愁。

冯天瑜，著名文化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汉口岳飞街3号“浮现”徐源泉公馆

◇ 刘汉桥 田联申

岳飞街，老汉口的一条欧式风格街道，繁华的商业街面中藏有公馆，民国时期居住过多位达官贵人。

武汉收藏家刘汉桥经过多次扫街探访和研究藏品，发现岳飞街3号曾是民国上将徐源泉的公馆。这应该是他继老家新洲和武昌昙华林之后，在武汉的第三处故居。

岳飞街曾名“霞飞街”

岳飞街建成于原法租界时期的1902年，初名塔那那利佛街（塔那那利佛原为法属非洲殖民地马达加斯加首府）；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改为霞飞大将军街，用法国元帅约瑟夫·雅克·塞泽尔·霞飞的名字命名；1943年，伪汉口市政府收回法租界改称圣德街；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汉口市政府改称岳飞街。

1896年，中法两国政府签订《汉口租

界租约》。1898年初，法国驻汉口领事德托美决定编制市政管理规定及设计街道布局。1902年，法租界建成类似国际象棋棋盘的网状分布街区，配套人行道和排水系统，宽阔的7条大街四通八达，塔那那利佛街是其中之一。

在规划布局范围内，法租界落成10座欧式建筑，已知如东方汇理银行、立兴洋行、工部局、巡捕房、兵营等，今岳飞街1号、3号可能也在这10座建筑之中。此前，法租界只有一座孤零零的欧式建筑——法国领事馆，它于1865年修建，被洪水冲垮后1892年重建（位于今洞庭街），领事馆外围为汉口第一个跑马场的跑道。

徐源泉公馆隐身街角

徐源泉（1885—1960）字克成，湖北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早年秘

密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参谋。1935年获陆军二级上将衔，是中国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抗日战争，1946年退役后，致力于工商文教事业，任辛亥首义同志会理事。1949年至香港，后转赴台湾，曾任湖北同乡会理事长、台北金瓯女子商业学校董事等职，1960年11月11日在台北病逝。

2019年6月，刘汉桥到汉口岳飞街连续扫街一周，对岳飞街3号印象比较深刻，它的正面被改造过，穿过一条巷子走到它的背后，老房子的装饰物尽收眼底。看到这些，就觉得这座历史建筑有来头。回到家里在电脑上反复搜索，却怎么也找不到岳飞街3号的建筑资料和人物背景。偶尔在网上看到回忆录中提到是徐源泉公馆，还有隔街斜对面是湖北省主席万耀煌公馆的说法，但苦于没有资料证实。

就这样带着疑惑，刘汉桥又反复去了几次岳飞街，以至波依也琴行经理刘群说这几天都看到他在岳飞街这里转。他笑着说：



岳飞街3号楼房（刘汉桥摄）

在扫街，看老房子，对汉口的历史建筑，看多了就有感情，特别是对目前还没有挂牌的历史建筑兴趣更大。只是没有挂牌的历史建筑资料少之又少，只能平时做有心人，多留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两件藏品破解疑惑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刘汉桥翻阅自己的藏品时，一本旧书、一枚旧信封令人眼睛一亮，让他看到了破解岳飞街3号之秘的希望，可以证明它就是徐源泉公馆。

一本书，是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社会部编印的《武汉调查初步汇集》，第85页有徐源泉的住址简介，表明徐源泉1948年就住在岳飞街3号。

一枚信封，是1946年5月8号，徐源泉从岳飞街3号寄出的。从信封的字面上可以看到如下信息：邮戳时间为1946年5月8日，收信人是重庆武昌中华大学校长王震寰（铁生）。信封正面有钢笔字：徐源泉给王之信，关于学校经费问题。因为徐源泉是武昌中华大学校董，很热心教育，对武昌中华大学多有资助。徐源泉曾在家乡黄冈仓埠创办正源中学（今武汉市新洲二中的前身）。

这两件收藏品的出现，可以直接证明1946年到1948年，徐源泉住在岳飞街3号这个公馆里。一本书和一枚信封，

回忆武汉海外统战工作的发端和拓展

◇ 王功安（口述） 范前锋（整理）

2021年11月，正式落户武汉已11年的“国字号”品牌——华创会在武汉成功举办，签订协议超过120个项目，涵盖智能制造、光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协议总投资额近7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签约项目落地武汉，为武汉画好华创会发展的同心圆，吸引、聚集海内外高端人才投资创业，助推创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东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打造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做出重要贡献。

如今，华创会在海外影响力越来越大，海外“朋友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海外朋友看好武汉、投资武汉、深耕武汉，愿与武汉结成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回顾百年党史和现代化进程，海外港澳台侨同胞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作出过

重大贡献，功不可没！这些成果的取得，不禁让我回忆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作为市委统战部部长，在市委领导下奋力开拓武汉市海外统战工作激情燃烧的岁月。

1984年，中央正式批准武汉实行计划单列，为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武汉市开展海外统战工作正是起步于1984年，在全国属较早。这年8月，我带队到广州考察，得到很多启发，于是我连夜向市委写了一封信。内容包括：汇报广州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做法和经验；提出武汉市着手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开列一份由我们掌握的在港澳的湖北武汉籍知名同乡名单，拟邀请其来汉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典系列活动。

市委十分重视我的意见，立即同意批准邀请“三胞”（即港澳同胞、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来汉,并划拨了一笔经费,由统战部着手筹备。那年头,受某些因素影响,统战部不便对外开展活动,最后改用市政协名义举办,实际筹备工作仍由统战部负责。最终,武汉市邀请了22名港澳工商、科技、文教界人士来汉参加国庆系列活动。

这次海外统战活动的成功,标志着武汉海外统战工作的开端。该活动成功宣传了武汉,宣传了党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联络加深了同乡、同学情谊,探索了工作经验,并为稍后成立香港汉港联谊会作了前期铺垫。此后直到1993年底我卸任统战部长,武汉市的海外统战工作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武汉海外统战工作起步

这一阶段从1984年国庆至1986年,两年多主要抓了如下工作:

一是大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宣传发动。1984年12月,召开全市统战部长会议,各区、县、局、大单位党委统战部长,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及有关人民团体负责人参会。我在会上专题传达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海外统战工作的做法及先进经验。次年5月,中央书记处关于加强统战工作“放眼世界,大胆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指示精神下达后,我们及时组织学习,发布《我市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初步意见》。

二是落实中央关于海外统战的各项政策。我们根据中央统战部关于海外统战工作的新要求,优先落实“三胞”“三属”的各项政策。据1986年底统计,享受“三胞”“三属”政策的共48297人,其中享受台胞政策的有1246人,去台人员亲属政策9108人。这项工作,极大争取了人心,激发了“三

胞”“三属”的爱国爱乡之情,为我市海外统战工作打下了民心基础。三是采取“请进来”方式,开展对外联络工作。除了上述邀请22位港澳人士来汉参加国庆庆典外,还配合市政府分别邀请了16位、9位、21位港澳友好人士来汉参加新建的黄鹤楼落成典礼、武汉国际杂技艺术节、武汉国际渡江节等重大节庆活动。

四是广泛动员在汉“三胞”“三属”同海外亲友通信联络。据1986年底调查数据,武汉市16600余有海外关系的人中,已有8000余人取得通信联系。有的还申请到海外探亲,仅1986年就有181名台属出境会亲访友。

第二阶段:武汉海外统战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开展

这一阶段从1987年至1991年,四年主要抓了如下工作:

一是于1987年6月首次召开全市海外统战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我市第一个以市委名义下发的海外统战工作正式文件——《关于武汉市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意见》,对全市海外统战工作做出总体部署。

二是摸底调查,查清全市“三胞”“三属”基本情况。统计数据是:全市15万多统战对象中,半数以上有港澳台侨海外关系,其中台属1万余户、3万余人;全市“三胞”及外籍华人(祖籍地为武汉)有9万余人,分布在64个国家和地区。

三是成立武汉海外联谊会等海外统战组织。我市召开第一次海外统战工作会议后,市委同意我们成立一个海外统战工作临时协调组,由刘则清副市长和我主持,有时市政协主席辛甫同志也参加。先后召开过8

次协调组会议，研究我市海外统战工作或重大活动。1987年6月，我们商市外办、经委、外经委、贸促会、科委5家单位，联合发文《关于我市出国团组和人员要积极开展海外统战工作的意见》，动员和要求全市各系统、各单位、各部门形成合力开展海外统战工作。12月，我们向市委提出申请成立全市性组织机构的报告，并草拟了《武汉海外联谊会章程》，很快得到市委批复同意。1988年5月30日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了由92名理事组成的武汉海外联谊会。

四是积极开展对外联络。1986年10月，我们与市文物办等合作，举办“黄兴先生文物手迹巡展”，邀请黄兴在国内外的后人及海外友好22人，来汉参加开幕典礼。11月，配合省、市政协，邀请36位海外友人来汉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1987年8月，支持市台办、台联及青联，举办首期“台港澳及海外青年武汉夏令营”，邀请29位国民党上层人士在海外的第二、三代来汉参加该活动。除了“请进来”外，我们还争取“走出去”。1987年7月，我派统战部副部长李文水等2人，随同市出口商品洽谈会代表团赴澳门，开展对外联络及海外统战工作。1988年4月，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辛甫带队，李文水等参加市经贸代表团赴新加坡考察交流。我则应香港汉港联谊会邀请率7人代表团，以市政协名义，赴港参观考察10天。这是全市政协统战系统第一次组团走出去。



1992年初，王功安（站立者）率武汉海外联谊会参访团访问美国洛杉矶等地

五是热情做好“送上门来”的联谊统战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这个阶段，由市委统战部接待“三胞”1172人次，外籍华人548人次。

六是做好政策形势宣传和释疑解惑工作。特别是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三胞”对内地产生一些疑虑和误解，我们瞄准“四有”目标人物（即在政治上有影响、社会上有地位、经济上有实力、学术上有造诣）做工作，专门派出代表团赴深圳，邀请数十位港澳老朋友来深座谈、交心谈心，消除疑虑。在40周年国庆时，我们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出面，亲自释疑解惑。我们还安排市各民主党派、相关人民团体开展“写封信，报平安”活动，向亲友、同乡、同学写封信、打电话、拍电报、寄宣传资料，让“三胞”认识事件真相，真切了解武汉。武汉海联会则直接给100多位海外重点朋友寄信，介绍这场政治风波的真相，为化解疑虑、争取人心起到积极作用。

七是利用经贸交流开展联谊。我们利

用每年2次“广交会”，分批组织各区、县、局党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开展服务经济、联谊交友。如1987年3月，市政协、侨办、台办、民宗局与市经委在深圳举办“武汉市出口商品洽谈会暨港澳亲友联谊会”，计划邀请150人，实际到会280人，共签订成交合同294份，合同金额4218万美元。我们还开展形式多样的联谊活动，如举办“汉港联谊会理事座谈会”“中南财大港澳深校友座谈会”“武大香港校友座谈会”“香港华师校友座谈会”“侨胞恳谈会”“港澳青年联谊会”“澳门同乡会”等等。市领导谢培栋、辛甫等参加。这次活动效果好、影响大，中央统战部《统战动态》刊发消息，并配短评，认为武汉市开创了一条海外统战工作的新路子。

八是积极搞好“三引进”。我们发挥联谊面广的优势，牵线搭桥，这期间累计共为武汉市引进项目370多个，投资金额累计达3800多万美元。



1993年9月3日，在武汉海外联谊会、武汉总商会举行的国际渡江节招待会上讲话

第三阶段：武汉海外统战工作奋力开拓

这一阶段从1992年至1995年。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发表重要谈话，“东方风来满眼春”，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武汉的海外统战工作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这五年主要抓了如下工作：

一是组织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解放思想，超前谋划部署海外统战工作。通过学习讨论，破除统战部只问“政”、不问“经”的旧观念，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海外关系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新思想；破除封闭、关门办统战的意识，树立主动作为、开门搞统战的思想；批评“海外统战是沿海城市的事，与武汉无关”的错误认识。

二是积极组团出访。1992年初，应美国朋友邀请，我们首次以武汉海联会名义组团访美16天，由我任团长。先后访问了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费城等地。访问重点

放在投资项目考察及联谊交友上，谢绝去“赌城”拉斯维加斯游玩。通过宴会、会晤、家访等形式，总共拜访了68位重要人士，其中一半以上为新结识的朋友，属中上层人士31位，属二、三代28位。向他们宣传武汉，邀请其来汉考察、投资兴业（萧政之就是这次请过来的）。同时，广泛考察美国市场、社会、华人社团、留学生情况，各方面收获都很大。

三是为全市“三引进”招商引资作出贡献。这个阶段，我们把搞引进作为海外

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先后以海联会名义，邀请陈香梅、邵逸夫、萧政之、张国安、高清原、郑裕彤、林嘉政等海外军政界、工商界知名人士及辛亥革命志士后裔 500 余人次来汉，接待新世界集团、统一集团、丰群集团等大、中型财团 14 个，牵线搭桥、洽谈投资项目 50 余个，意向投资总额 30 亿元；最后签订正式合同 7 项，总投资额达 18.5 亿元。项目主要涉及房地产、老旧国企改革、高速公路、桥梁、服装、食品、饮料等。1992 年底，我受市委委派，专程到中央统战部拜会了部长王兆国及万绍芬、刘延东、郑万通三位副部长，以及张蒙纳秘书长、胡德平（五局 / 经济局）局长，得到各位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们首选并积极促成了爱港爱国的香港新世界集团来汉投资。此时，郑裕彤先生已是国务院港事顾问、全国工商联副主席。1993 年 2 月，武汉市政府与香港新世界集团正式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6 月 5 日，我及我的继任者胡照洲部长，陪同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钱运录和新世界集团董事局主席郑裕彤等，包租“巫山号”游轮，自重庆到武汉顺流而下畅游长江，一路观赏三峡风光，共历时 3 天 2 夜。大家在友好轻松的气氛中沟通商谈，进一步巩固了双方合作的基础。至今，香港新世界三代人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在武汉投资的大型项目包括长江二桥、天河机场路、常青花园社区、新世界百货、新世界大酒店、周大福珠宝产业园等，总投资超过 100 亿元。武汉引进香港新世界集团，仍是迄今武汉对外开放史上的一例盛事和标志性事件。

四是“既当红娘，又请红娘”。我从美国洛杉矶请来的“红娘”萧政之先生，又充当“红娘”帮我们请回来一批投资商，比如台湾统一食品集团、丰群投资财团、宏国

建设、斯米克瓷砖、美加外校等 14 家，其高管均被聘任为武汉海联会顾问或理事。通过他们又牵线搭桥做新的“红娘”，介绍更多海外工商界人士及企业家来汉考察、投资兴业，形成武汉市全方位利用外资格局。

五是加强“汉台经贸关系”理论研究和文化海外统战工作。我发起成立武汉市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由我任首任会长），不定期召开“汉台经贸关系”研讨会，从理论、历史渊源、发展战略上研究、论证汉台两地经贸关系，促进汉台合作及通商、通邮等“小三通”。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汉台两地文化界、教育界、科技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研讨，特别是地域性很强的三国文化、黄鹤楼文化、荆楚文化的交流，这实际上承担了到 2003 年才正式挂牌成立的武汉市中华文化学院的工作职能。搞文化统战，以文化认同促政经共识，一方面做到“以文会友”、争取人心；一方面“文化搭台，经贸唱戏”，均取得良好成效。

王功安，原武汉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范前锋，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四级调研员

开沅师为我“站台”记

◇ 涂文学

1999年5月，首届黄陂木兰文化节在黄陂木兰湖举行，我与章开沅先生、皮明麻先生作为嘉宾应邀与会。其时我有意报考华师中国近代史所博士研究生，于是请皮先生帮我引荐，请章先生收我做弟子。会议进餐时，皮先生向章先生提及此事说“文学想拜在您的门下”，章先生即爽快应声：“好啊，那我就要摘桃子了哦！”

此时我在武汉市档案局工作，任副局长。但之前一直在市社会科学院随皮先生做武汉历史文化研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聘为研究员，故先生有“摘桃子”之戏语。

—

2001年9月，我通过考试正式成为华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所里为我

安排的指导老师是章开沅先生和严昌洪先生。因为章先生年事已高，我的研究生学习研究主要由严老师指导，但章先生在我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较为关注，多有点拨。其间有几次谈话我印象颇深。

论文开题时，先生对我的开题报告看得十分仔细，报告中我引用了美国学者李·麦萨克论文《上海之外：从圣迭戈看中国城市》（《城市史研究》第13、14辑），先生就译“圣迭戈”还是“圣地亚哥”谈了自己的意见。我的学位论文研究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汉口市政，先生指出，论文虽然只是研究汉口一个城市的市政，但可以以小见大，把30年代的汉口放在当时中国乃至全球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考察，使小题目做出大模样。开题报告会时，我已年过不惑，而我的同学都还是二三十岁的“小青年”，颇觉尴尬，先生半是调侃半是鼓励地笑道：“文学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2006年春，经过几年艰苦学习，我终于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论文答辩时，章先生因为外出开会不能出席答辩会。行前，我与昌洪师一起去拜见先生，先生表示：“这次出差是早就确定了的，很遗憾不能参加！”他转而对严老师说：“文学的论文写得相当不错，将来可以申报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只可惜我因行政工作繁忙，读博期间未发表相关学术论文，不符申报条件而作罢，既辜负了两位老师的厚望，也给自己留下终身遗憾。

2009年，我的论文《城市早期现代化的黄金时代——1930年代汉口的市政改革》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先生为拙著亲撰序言，颇多奖掖。除了称赞论文运用多学科全面、系统、深入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汉口“市政改革”，“把城市史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尤其表扬了我对武汉城市的“大爱情怀”：“文学作为土生土长的历史学者，正在殚精竭虑履行自己的职责……将大爱融入城市研究，完全是出于对乡土的热爱、民生的关切。作为师友，我为此深感欣慰，并略缀数语致敬。”

二

先生把武汉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也正是出于对武汉的大爱，先生对我和我所



涂文学与章开沅（中）、严昌洪（右）合影

从事的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和热情鼓励。2005年，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成立，先生欣然应聘为顾问；2019年城市研究所主办的《武汉学研究》创刊，先生亦为学术委员会顾问。城市研究所但凡举行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先生只要有空都到会指导，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是两次抗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章先生均莅临大会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引起极大社会反响。

一次是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江汉大学联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武汉市政协共同举办“抗战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并为后来我主编的会议文集《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序。

先生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先生回顾了过往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历史，认为由于历史恩怨，抗战史研究流于片面，难以全面和深入，更重要的是给日本右翼势力以借口，不承认

中国是真正的胜利者，“他们承认苏联、承认美国是远东战争的胜利者，说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不承认中国的胜利。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贬低了。所以我提出要超越历史，既尊重历史又超越历史。所谓超越历史就是把历史的恩恩怨怨，把这些党派成见，把这些不正确的宣传要重新清理一下，大家共同恢复抗日战争的本来面目。”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研究抗日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先生认为抗战历史丰富，内容很多，但是“我们研究抗日战争，我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经常讲一句话，不仅在大陆讲，在台湾讲，在香港讲，在国际上也讲，在北美讲，在日本也是这样讲，我们是要保留一个正确的、正当的、必要的历史回忆。”先生认为，我们对抗战史的研究，不是为了加深仇恨、渲染仇恨、扩大仇恨，而是为了消除仇恨。通过对日本发动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的研究，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摒除战争，消弭仇恨，维护和平，“所以历史是不能歪曲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应该用历史很好地教育各国人民、世界人民，来共同反对非正义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第三个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这段历史？“我们研究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宣传。过去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日本一些右翼势力钻我们的空子。我们是学者，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学者的态度，客观地、如实地进行研究，不是一个诗歌，不是一个小说，不是一种政治宣传，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如何避免和摒除这种“宣传式的研究”？先生提出一要“非常注意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与发布。”“把历史非常确凿的证据都提供出来，这是颠扑不破的。”再者，抗战史的研究“不仅要讲重要性，还要扩大广度、深度。”先生对我们

召开以“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表示赞赏，认为对扩大抗战研究的广度上有所裨益。但是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问题还很多，“不仅研究敌后根据地，也研究正面战场，也研究大后方、国统区，也研究沦陷区。不仅研究国民党，也研究日本。的确，历史本来很复杂，我们要全面地进行研究。”先生还以湖北抗日战争史研究为例，如慰安妇、陈诚与湖北抗战、抗战时期湖北政治与文化西移等问题，指出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多多，给与会者尤其湖北武汉本土学者很多启迪和教益。

另外一次是2008年秋天为纪念武汉抗战80周年，江汉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武汉市政协联合举办的“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先生以82岁高龄亲临会场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历史记忆与城市升华——纪念武汉保卫战70周年》的主旨演讲。

演讲中，先生对武汉保卫战给予高度评价，指出“武汉保卫战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武汉曾经是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引领着全国各个主要战场的浴血抵抗，特别是通过国共合作而彰显的同仇敌忾，武汉曾经成为凝聚整个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先生认为，“历史记忆是城市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不仅增添了城市的底蕴与魅力，而且可以促进城市的升华。”他以南京将日军大屠杀衍生的悲情城市情结，逐渐转向为营造和平之都为例子，指出武汉“迟迟未能重视武汉保卫战的历史记忆”的不足，呼吁武汉市领导和武汉学术界“不辜负海峡两岸热心人士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殷切期望，努力研究武

汉保卫战，并且弘扬当年那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把武汉建设得更为美好，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歷史名城与国际大都市。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告慰武汉保卫战中外先烈们的在天之灵。”

先生一直关注抗日战争史尤其倾力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因此对于我及我们城市研究所有关武汉抗战史的研究特别厚爱，倍加鼓励。2018年10月，我与武汉市博物馆馆长刘庆平兄主编的《武汉沦陷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付梓前夕，我将清样送先生审阅并恳请先生赐序。先生一直对武汉学界疏于武汉抗战尤其是武汉沦陷史的研究颇感遗憾，看到我们终于拿出洋洋50万言的《武汉沦陷史》，十分高兴，欣然应允。他在序中说：“文学最近携《武汉沦陷史》部分书稿前来看我并要求作序。我既已为重庆《大后方丛书》（共100卷）写序在前，自应为《武汉沦陷史》撰序鼓呼于后，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文学为武汉土著，曾师从皮明麻、冯天瑜治武汉城市史，又曾任职于武汉市档案馆多年，对武汉地区历史文献了如指掌，如数家珍。由他主持编纂《武汉沦陷史》，堪称最佳人选之一，必将大有所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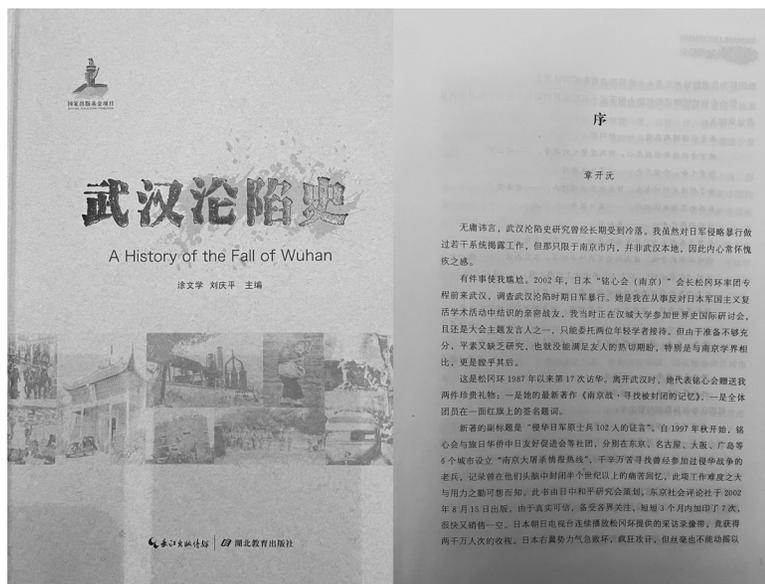
序言中，先生对我们以城市史的视野观照武汉沦陷史颇为赏识：“武汉沦陷史本来就是武汉城市史的一部分，而从城市史的角度叙说武汉沦陷史，视野更为宽阔，视角更为多元，视觉也更为敏锐与深刻，不会停留于就事论事或表象之谈。作者在绪论中用20余页的篇幅深入阐释战争与城市的关系、沦陷史研究的城市史视野、沦

陷对中国城市的影响等，从理论与学术路径两方面都有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

作为一代史学宗师，先生有更深邃的学术眼光和悲悯情怀，也就是史学研究尤其是沦陷史研究如何以人为本，关注人类的命运。这是我辈年轻学人的一个重要缺陷，也是《武汉沦陷史》主要不足。但先生并未过多指责，只是善意地提出希望：“当然，无论从何种视角考察，沦陷史的主体都应该是直接蒙受残害的城市居民，而如何看待沦陷区的众多城市居民，至今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疑难问题。”先生提出的问题发人深思，对于我们在城市史研究中深入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关注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人尤其是普通人的命运具有启迪意义。

三

2009年岁末，我由江汉大学调任武汉城市职业学院院长。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前身是1904年由两湖书院、两湖大学堂演变而来的两湖总师范学堂。我到学校工作后，



章开沅为《武汉沦陷史》作序

认为这笔重要的历史遗产弥足珍贵，便着手校史研究工作，组织力量编纂《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校史》，举办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校史陈列馆，正本清源，基本理清了学校自两湖总师范学堂以来的100多年历史。在百余年的办学历史中，很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或在校学习，或在校工作，如中共一大代表中3个湖北籍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就都曾在两湖总师范学堂和湖北省实验师范学习和工作过。校史的研究和陈列，不但激发了全校师范的自豪感，而且扩大了学校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4年，正值学校办学110周年，我们举办了“中外高职院校校长论坛”和“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之前，我专程到华师中国近代史所先生办公室，向老师介绍了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办学历史，汇报了校庆系列活动设想，真诚邀请先生出席“张之洞与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先生听完汇报后，对我的工作和设想予以肯定，并鼓励我以张之洞为榜样，以现代教育家的视野和气魄办学，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蹚出一条新路来。但说到参加会议，先生颇为踌躇，说近来身体状况欠佳，不一定参加得了，但也没有完全封口，说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

11月18日研讨会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北校区隆重举行，上午8点钟，我接到先生电话，告诉我他将出席研讨会，这令我喜出望外。先生到后对我和一干迎接他的校领导说：“因为身体原因，近来我很少出席外面的活动，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与张之洞有关，张之洞是对湖北武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你又是我的学生，我应该出来为你站台！”先生的话使我和诸位校领导深受感动，倍感温暖，赢来一阵热烈掌声。

研讨会上，先生参观了校史陈列馆，对于我们重在介绍办学历史，不渲染当下办学成就的陈列理念给予高度赞赏。在研讨会的主旨讲演中，先生纵论张之洞在湖北的历史功绩，指出张之洞在发展工业上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最大的贡献不是在工业，而是在思想教育方面。张之洞是一位大教育家，在废科举、兴学堂方面有着突出贡献。曾经规模宏大的两湖书院和后设在其内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都是人才辈出。先生对长期以来湖北不重视张之洞新政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颇有微词：湖南人把岳麓书院完整保存下来了，但湖北人把两湖书院弄丢了，十分可惜。因此，先生希望：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两湖总师范学堂，如果学校有魄力，我建议一是在校园内为张之洞塑像，二是重建两湖书院。这样一个校园建筑既可以作为学习场所，还能恢复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给民众追思先贤的机会。研讨会和整个校庆活动结束后，我们开会认真研究落实先生的两条建议，探讨在校园内复建两湖书院的可行性。

惜乎次年年初，我工作变动，调回江汉大学工作，先生的建议遂束之高阁，不了了之，良好设想竟成遗愿。我作为先生的学生，没有能完成先生交办的任务，一直引以为憾，愧对先生。今先生已驾鹤远行，愿先生一路走好，早登极乐！

涂文学，江汉大学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履职十五年，为百姓“算账”

◇ 周永先

人物名片：周永先，市政协委员、华夏银行武汉雄楚支行副行长、湖北省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我于2000年1月进入九三学社，不久被推选为江汉区政协委员。2001年10月，经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和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推荐，我获得武汉市政协委员资格提名，随后光荣成为政协武汉市第十届委员会委员。除2010—2015年因赴异地工作终止委员职务外，我自2002年1月到2021年底，共担任三届十五年的武汉市政协委员。其间，学政协、懂政协、干政协，我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循序渐进、逐步成熟的漫长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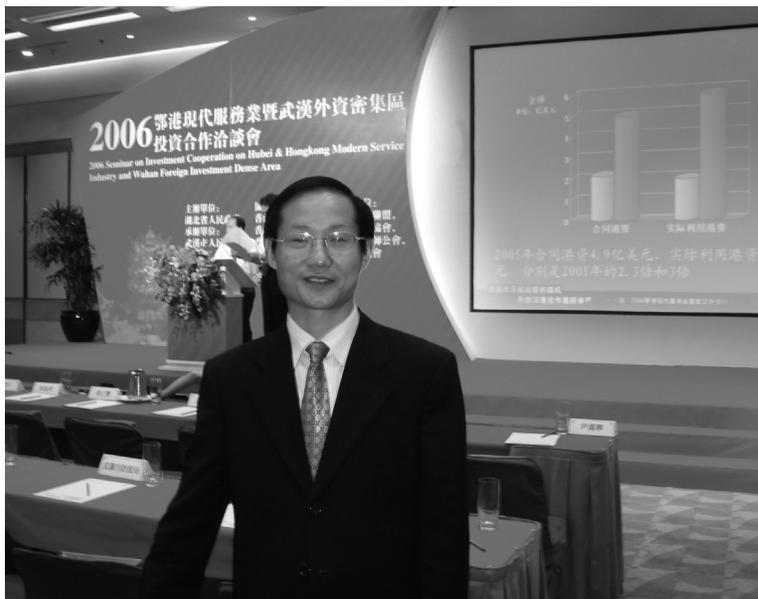
学政协：发挥特长，“算账”助民

我本科和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后攻读华中科技大学金融经济学专业获得博士学位。我从华科大毕业以后，就

职于物价局，勤勉工作七年。后进入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起先做证券工作，后来接手金融业务，帮助企业做品牌管理、风险管理，处理银行的行政事务等。银行中的大部分基层工作我都亲身实践过，而且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当武汉市政协举行换届选举时，我因较强的学习能力和丰富的金融业工作经验，被推选为第十届市政协委员。

回想当时初入政协，心情真是惊喜交加，不知道提案怎么写、怎么发言、怎么抓住各类会议的重点，着实有些诚惶诚恐。因此，我积极参与市政协的各种座谈、调研和视察活动，尽量做到不请假不缺席、不迟到不早退，全身心投入。慢慢地，我熟悉了市政协的工作思路。结合经济、金融学的专业背景，我觉得做一名合格的政协委员，不仅要会算好国家、省市的经济账，更要为百姓的幸福安康算好账。

2005年1月12日，在和市长李宪生面对面的座谈会上，我提出将现行公积金贷款



2006年赴香港参加汉港投资合作洽谈会

限额从 25 万元提高到 50 万元，并实行分月扣划、及时还款的建议。

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呢？第一，当时在武汉城区买房已经要上百万了，而公积金贷款限额 25 万，按揭买房的市民要承担很重的商业贷款利息压力。部分老百姓可能为尽量减少贷款而想办法筹钱，还有部分老百姓在这种压力下或许就买不起房，这样房地产市场景气不起来，老百姓想买房买不了。第二，老百姓每年都要去提取一次公积金，手续繁杂，不方便。并且公积金存款的利率是比较低的，在银行里存一年了再用来还贷对于老百姓来说也不划算。当时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是公积金的 4 ~ 5 倍，公积金进入商业银行的资金库，则可以由银行调配。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是不希望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的，也不想增加成本开发软件进行按月扣划。

就在这次市长座谈会召开的前十来分钟，我提前到达会场，一进门就见到了正在翻阅资料的李宪生市长。我大胆上前拿出自己那份提案，向市长解释情况，并且

强调道：“这个事情上海做了、深圳做了，武汉为什么不能做？这里面有个利益问题，如果想发展房地产市场，想方便老百姓，让老百姓付出更少的成本，那我们就应该坚决地向上海、深圳学习！”李宪生应该是受到了触动，在督办这项提案时，态度坚定，十分重视。不到一年，这个提案就转化为实施方案并落地。

这一提案冲击到了商业银行的利益，银行业的同行颇有微词。但作为一名政协委员，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我提案的出发点是为老百姓代言，为老百姓谋实惠。道之所在，纵千万人吾往矣！

干政协：尽心尽责，躬耕济民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需要认真撰写提案，反映民情。提案从哪里来？我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总结为三点：第一，源于生活。我接触、我了解、我体会。正如歌德所说：“相信生活，它给人的教益比任何一本书籍都好。”第二，结合专业和特长。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要用于做正确的事。只有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才能把握事情的是非对错，才能洞察未来的发展方向。第三，结合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规划。市委、市政府长期关注武汉经济金融问题，而我在这方面有理论基础，理应运用好自己的专业能力，为武汉市的经济民生把脉。

2010 年，在武汉市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我提出“房地产抵押登记实行‘一

证’制，房产抵押贷款登记只办理房屋他项权证，不办理土地他项权证”的建议，得到时任市长阮成发同志的充分肯定和支持。市房管局对这一提案给予的答复，明确了新建房屋试行房地产登记“一证制”。方案实施后，节约时间，节约费用，减少资源占用，便利了市民，也有利于武汉市的房地产稳健发展。提案办理单位认为这是一项合民心、顺民意的好建议。2014年11月24日，国务院下发《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权证书合二为一，仅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这证明武汉市房地产登记实行“一证制”的建议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超前思维。

结合自己从事过证券业务的经历，利用股票市场的朋友圈子，同行业内人士深入交流和探讨，吸取股民的合理化建议，我于2011年撰写了《关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建议》，提出按照持仓市值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2012年中国证监会推出了市值配售政策。其中，中签起步数100股的建议，在2021年北京证券交易所新股发行制度中得到实施。

时任武汉市政协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处长的郑水平就《关于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建议》这一提案，曾在座谈会上称赞道：“周永先教授，写的东西有论据、有论证、有建议，写得非常好！”这给予了我很大的鼓励，激励了我参政议政的信心。

建议多次被采纳，让我深刻体会到政协委员建言献策转化为政府部门为民办实事的成效，心中倍受鼓舞。

懂政协：提案有据，履职为民

2017年初，作为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我开始第三次履行职责。我在学习十九大报告中感受到，政协委员要有民生情怀，要找准老百姓的痛点。周末，我常常下沉到社区，和老头老太们一起晒太阳，聊天时就问问他们的生活起居有没有困难、医疗报销能报多少、退休金领取方不方便、儿女是不是生活在一起等等。归根结底还是民生情怀，你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就要深入到基层之中，深入到百姓之中，深入到弱势群体之中。

我曾在2017—2019年组织民营企业企业家到红安革命老区，向低保户贫困户捐献冬衣，向小学捐献现金10000元，向七里坪养老院捐献食品及现金10000元，组织朋友圈开展关爱困境儿童的活动。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社会哺育了我，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的履职尽责不仅要体现在文字材料上，也应落实到惠民、助民的行动中。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武汉暂时关闭



2018年冬赴红安永佳河镇小学捐资助学

离汉通道，社区也管控起来了。在公交停运情况下，我担任护医志愿者，顶风冒雨，自驾车辆接送医护人员，保证她们顺利上下班。为助力抗疫，我先后提出“开放洪山体育馆等公共场馆，改变居家隔离实现集中隔离疑似病人”“建设无疫情社区”“延迟春节假期”等建议，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多项建议得到快速实施，成效显著。

其间，我听说过一个事情，心痛难言，也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当时九三学社的志愿者到建机社区帮忙买菜送菜。一个老太太头天先登记了要3根黄瓜，第二天送菜过去时告诉她价格，是8块钱。她说：“太贵了，我只要一根。”8块钱，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过个早，连打车的起步价都够不着。但是这个老太太没有收入来源，这3根黄瓜8块钱对她来说，已经很贵了。像老太太这样的贫困群体还有不少，许多都是武汉老厂子的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这些老厂子像建机、莺歌电视机厂、手表厂等早年因为经济不景气、经营不善等都垮了，剩下这些年纪很大的下岗职工，每个月领取一两千块的退休金。有些孤寡老人，伴侣去世后领不了退休金，没有收入，靠拾荒度日。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企业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随之而来的便是裁员、降薪，有的甚至就像以前的那些老厂子一样倒闭了。老百姓就业困难、收入骤减，更不敢消费，市场愈发没有活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我想的是如何打破这一循环，抓住疫后经济重振契机，将武汉建设成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经济发展来保障和改善民生。

2021年初，我执笔的《把武汉打造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被列为全会重点提案。后来，经过半年的调研，市政协经济委员会

的同志将其完善，修改为《关于积极融入“双循环”发展格局，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议》。

市政府认真办理此提案，制订了工作方案，并督促各单位落实工作任务，年底召集各单位汇报了任务完成情况。此后，武汉城市消费服务功能不断提升，2021年1—10月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52.89亿元，同比增长12.7%；外贸进出口完成2727亿元，同比增长28.9%，有力推动了经济全面恢复、快速增长，为加快打造“五个中心”、建设现代化武汉提供了强大动力。

十五年政协委员，光荣而骄傲。我深深体会到，政协是自己增长知识、增添智慧、增进才干的学校，是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开展民主监督的战场，是关联党群关系、亲密干群关系、密切与市民百姓血肉联系的桥梁，是效命国家、奉献社会、关爱弱势群体的道场。我今年58岁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只要党和人民还需要我，我就会继续奋进，为百姓和武汉算好经济账、民生账和长远发展的账！

在汉再续“从政”生涯

◇ 魏启响（口述） 郑雅飞（整理）

人物名片：魏启响，十三届市政协委员、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副董事长、武汉外资协会会长、湖南大学研究生导师、长江大学客座教授。

—

我是湖南衡阳人，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被湖南省粮食学校录取，成为“新三届”幸运儿之一，主修会计专业。

当时组织和社会对于“新三届”寄予了很高期望。我毕业后被分配到衡阳市粮食系统工作，坐在回乡的绿皮火车上，称得上是“荣归故里”。工作后，我被列入重点培养的“第三梯队”，每个岗位都做得比较出色，得以一路升级：从成本会计、副科长、科长、团委书记、人事科长，到工会副主席、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1989年，提升为

衡阳市饲料厂和龙翔饲料厂副厂长，1992年担任厂长。在体制内工作的15个春秋，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或优秀党务工作者。

1996年，我看到正大集团的招聘信息。正大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跨国公司之一，由华裔实业家谢易初、谢少飞兄弟于1921年在泰国曼谷创办，1979年进入中国投资，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当时正大集团在中国主要是发展饲料和养殖业，和我的工作背景相符，并且这个集团公司带来的是全新的技术、管理和生产经营方式，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吸引了我向外探寻的目光。

我是正大集团北京总部直接聘用的管理人员，北京总部安排我辗转全国多地任职，历任正大集团中国区所属部分公司和地区的财务总监、财务副总裁、资深副总裁。

目前，我任职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副董事长、中南区 COO，锚定武汉，参与管理决策工作辐射中南五省。2008 年 5 月 1 号，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这天来到武汉，屈指算来已近 14 年。

武汉正大有限公司是武汉市政府引进的十大重点外资项目之一，1992 年与武汉农业集团所属畜牧发展公司签约合作，是一家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2017 年为配合武汉光谷地铁配套建设，武汉正大从东湖高新区迁至阳逻，并于 2018 年 1 月正式搬迁，创造了当年动工、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纳税的新洲“四当”速度。

2016 年，武汉市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当时市委统战部电话联系我，让我去参加为期 5 天的培训。会上，统战部领导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应加强政治学习、履行社会职责。刚开始还未意识到自己与政治挂钩，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感受到组织层面的重视，我的思想也跟着上了一个新台阶。

新年伊始，市政协举行换届选举，意想不到的，我一个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异乡之人，成了武汉市政协委员。1956 年，毛

泽东主席三次横渡万里长江，体验“极目楚天舒”，看到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武汉；时隔 60 年，我追随故乡伟人的足迹，深耕于这片江城沃土，何其有幸，能为她献一抔智慧、播一地芳茵。

我也深深感受到，武汉这座襟江带湖城市正进一步地开放她的怀抱，畅达她的耳目，只为咨诤善道、察纳雅言，谱写新时代的新篇章。

二

2015 年，我被推选为武汉外资协会会长，2020 年任期届满后再次当选。许多外资企业来武汉，第一站就是到武汉外资协会了解情况、寻求帮助。武汉外资协会期望成为武汉与外资企业友好沟通、深度合作的桥梁和纽带。我们会积极与对方沟通、促进合作。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阻力。

现在推行的“网上办、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是“放管服”改革后的审批服务优化政策，确实效率很高。但几年前，来汉投资办厂的外资企业常会面临手续繁杂、审批流程多时间长等问题。还有我国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但落实到各个地域行业，享受到的政策待遇各不相同。当时有个会员企业投资公共交通运输产业，而公交车票价为了惠民，由政府统一制定较低价格，投资者连年亏损，又得不到政府补贴。最后经过协商，这家公司拿到一些补贴，改善了企业的经营。

这类问题总的来说，是武汉外资营商环境建设中必须打通的各种“难点”和“堵点”。



武汉正大搬迁至阳逻的新工厂

放眼中外各类城市，凡经济发展好、社会进步快的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外来人口多，外向型经济发展比较好。

2017年1月，履职不久的市委书记陈一新调研市商务局，强调切实抓好招商引资“一号工程”，发挥以外招外、以商招商的特殊作用。武汉抓招商引资工作，对于我和更多的外资企业代表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我作为市政协委员，更有必要围绕政府发展战略参政议政，收集外资企业的意见，畅通政府的信息渠道，分析政策实施遇到的难题，提出得力的解决方案。

于是，我在市长座谈会上提出建议：推动“一号工程”，做好以商招商，落实“六个建立”，引资事半功倍。其中，“六个建立”是指建立接洽和建设期责任制度、外企联系人制度、责任人考核制度、严格执行协议制度、外企问题反映制度和外企走访调研制度。这“六个建立”覆盖了招商引资的全生命周期，从接洽到执行，从问题反馈到走访调研，强调责任到人、考核有据、执行有力、有问必答、有错必究。

后来，我收到市商务局的答复函，提案中的建议大多得以落实。如武汉启动“千名局级干部联系服务千家企业”和“万名处（科）级干部联系服务万家小微企业”活动，要求结对干部当好“四员”——惠企政策的宣传员、项目代办的服务员、企业发展的勤务员、招商引资的信息员。市政府常务会议建立招商引资周通报制度，出台招商引资综合绩效考评办法。市治庸问责办起草损害经济发展环境行为问责暂行办法，由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全市实施。市商务局会同武汉电视台在《武汉新闻》中开设“作风聚焦”栏目等。

2021年1月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我市经济外向度长期偏低，优化营商环境还需持续用力等不足。为此，我建议赋能外商投资企业服务中心，方便外商投资企业到汉后高效对接服务。同时，建立一套对服务机构工作绩效进行考评的机制。更好发挥政府部门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店小二”作用，持续提升城市对资本的吸引力。

抓营商环境就是讲政治，就是谋发展、惠民生。作为政协委员，我将聚焦重点环节持续发力，为企业和群众发声，为政府建言献策，为武汉的疫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攻坚克难。

三

“三农”事业是顶层有设计、各层有安排、基层有期盼的大事，正大集团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事业的发展，积极践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利国、利民、利企业”是正大集团的经营宗旨，这一理念也渗透进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中。我一直致力于发展农牧食品产业，有着浓厚的“三农”情结，想为农民谋实利、为农村经济发展出实招。

结合多年来在正大集团的工作经验，以及正大集团实行新的农业生产模式所取得的成绩，2018年，我提出《创新发展模式推进农业“四位一体”》建议案。2020年11月，在市政协召开的界别协商会议上，我做了《推进农业生产“四位一体”提高农产品优质供应》发言。“四位一体”简而言之是指：政府出政策、农民做业主、银行给资金、企业做运营。

“四位一体”虽是创新举措，但模式可行、方兴未艾，国外和国内都有成功的经验。如北京平谷、昆明东川的正大300万只



参加市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

蛋鸡全产业链项目，湖北襄阳、江苏邳州的正大10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等。“四位一体”模式能够着眼中长期，集中各方优势，推行集约经营，实现参与方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符合农业生产的内在需要，适应食品安全的根本要求，做到可持续发展。

2021年3月，正大集团应邀参加“相约春天赏樱花”经贸洽谈会暨世界500强对话湖北活动，集团领导提出以“四位一体”模式在鄂投资4个100万头生猪全产业链项目，预计建成后年产值4百亿元左右，年税费40亿元左右，带动就业3万人左右。

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农村电商发展情况。2014年以来，农村电子商务连续6年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武汉农村电商受到市委、市政府重视，2019年出台《关于推进全市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实施意见》。近两年申请省级专项资金628万元，建成“农村淘宝”区级服务中心、物流集散中心、村级服务站65家。

武汉农村电商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农产品电商物流有障碍，存在网络少、价格高、时间长等不足；

缺乏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概念；农产品电商安全难保障；等等。为此，我于2019年11月提出《整合农村电商网络畅销乡村特色产品》建议，期待各方都能心系农村、心有农民、心想农业，合力打造农民快乐卖、市民放心买、物流畅通行的电商新格局。我也坚信武汉的乡村特优产品电商事业，一定能跟随“三化大武汉”建设的惊人节奏，伴奏出优美的乐章。

我作为武汉市政协委员履职已经五年，历年各次大小政协会议及活动都积极参加并发表建设性意见；每年高质量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不少于4篇，并参加重点提案调研协商和发言；首批建立委员工作室并发挥作用；三次参加市政府工作报告草案讨论及市长征求意见，四次参加全会期间市长与委员见面会并发言；连续五年在130名经济、农业和农村界别委员中得分排名前十。

作为外资企业、农业和农村界的代表人士，我代表企业、群众参与国事、市事，履行职责。这是荣誉，更是责任。感谢武汉这座城市，给了我第二次融入体制内“从政”的机会，我也时刻提醒自己常怀爱民之心、常谋富民之策、常为利民之举，主动想党和人民之所想、急党和政府之所急、谋党和国家之所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充分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为武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从水乡走来

◇ 蒋喜（口述） 严濂（整理）

人物名片：蒋喜，湖北省浙江企业联合会（总商会）副会长、武汉市台州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北鑫全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全丰食品原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市中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北省调味品协会副会长。

“山在城中，江穿城过。”浙江省台州市是江南水乡，有水穿城而过。历史上台州“河网密布、港汊交纵”，水乡风韵不亚于苏杭，有“走遍苏杭、不如温黄”之说。生于斯，长于斯。水乡的婉约与绵延，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

我从水乡走来，水乡的风土人情对我有着深深的影响。如果说“智者乐水”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上善若水”是一种对社会的责任，那么“水滴石穿”就是一种创业的精神，所谓“弱之胜强，柔之胜刚”，我愿是一条“不舍昼夜，盈科而进”的小溪，潺潺不息、奔向大海。

袭故而弥新

真正的幸运，不是逢山有路、遇水有桥，而是努力后有所得、坚持后有收获。那些日积月累的努力，会慢慢转化为你的能力，离你的梦想越来越近时，你会感激当初选择坚持自己。

这是一个空间换时间的概念。本质上我是不愿意“下海”的，这无关于我对商性的理解和人性的悟道。促使我接过父母创业担子的，是我的骨子里潜伏着的那份倔强。那是2004年，父母辛苦几十年打下的“江山”，却因为处于低层次的无序竞争遭受同行不正当碾压，处于行业生态链低端的作坊式家庭产业岌岌可危；每当看到父母辛苦忙碌、逐年老去的身影，我内心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油然而生：百善孝为先，我心疼父母的艰辛，也渐渐读懂了父母的期待：父母辛苦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为家族挣下了一番家

业，作为女儿，我责无旁贷的担起了捍卫生存空间并把它发扬光大的责任。

重任在肩，面对没有技术壁垒、没有入市门槛的传统产业模式与经营方式，革新与升级成为二次跨越的一大人生考题。一方面，我需要努力捍卫父母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维持家族利益的稳定；另一方面，这种“传统”的产业形态与我心目中的“企业”相去甚远，我不得不寻求创新与突破的途径。相对于父母的“稳”，这无疑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能力是最好的证明。我必须用事实向他们证明，我所走的每一步，我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基于对商业特性与企业发展的理解和思考。

这五年，我从基层做起，作为销售和采购经理，去了解公司整体的运作；这五年，我脚踏实地，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细节；这五年，我通过自主学习与行业关注，不断汲取自己进入“商门”的知识与信息；这五年，我熟悉了食品原料和添加剂领域采购、分销原料市场的产业链条；这五年，我理顺了“万全”在经营管理及市场竞争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

我准备好了。虽然知道这很难，但必须要去做。也是这几年让父母看到了我身上足以打动和影响他们的能力。经过和父母来回的探讨，几经周折，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东西湖区的一片土地，盖起了自己的工业园，从此结束了靠租赁场地加工生产的局面。自此，“全丰”终于有了自己赖以发展的产业基地。

我觉得，对父辈最好的尊重就是发展，对产业最好的尊重则是突破。破而后立，创而弥新。

尤其说是寄托，倒不如说是一种希冀、一种追索、一种崇尚。

谋定而后动

天才不是一种“造势”，而是一种“识势”；勤奋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更多的体现于思维；精神不是空虚的幻想，而是现实的支柱；文化不是牵强的附会，而是一种历练后的彰显、沉淀后的积聚、静寂后的薄发。

这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概念。经世得有目标，经业得有谋划。目标常定常新，这是因为时势在变、环境在变、政策在变；谋划有详有略，这是根据发展的需要、商战的需要、实施的需要。

市场的发展不再是单向的、单一的，而是线性发展、链状延伸，企业经营是产业与区域、市场与服务、生产与营销的统筹，是资源整合和综合利用、产业延伸与内涵扩张的关系。如果说客户与渠道是市场的主体，那么整合与融合就是创新的主体。市场从来都是严酷的现实，你不主动去整合，就会被市场整合。

于是，我开始搭建自己的班底，开始打造自己的技术团队、销售团队与管理团队，开始整合人才、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开始寻求企业的新增长极。

依据这样的经营理念，2008年，武汉市全丰食品原料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由我出任公司董事长。同时招拍挂约20亩工业用地，并于2009年开始建设中体科技产业园。

在我的计划里，比较倾向于以5年为一个规划周期，然后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一步稳健地去实现的。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一进步、三年一大步、五年一变化：2012年，我们成功建成中体科技产业园，武汉市全丰食品原料有限公司于当年入驻。同年，

招拍挂约 45 亩工业用地，并于 2013 年开始建设中体联动科技园。时至 2017 年，近 7 万方的中体联动科技园正式建成。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创新和变革，是时代发展的命脉也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如果思维不能突破，模式不能创新，就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很容易被时代所抛弃。“全丰”旨在创新，不断突破。我们要做食品行业的领跑者，正如我们企业宣传语中讲到的：如果说中国的食品添加剂和配料行业是一片沙漠，那“全丰”就是一匹骆驼；如果说它是一片大海，那“全丰”就是一叶扁舟。

我愿承重前行，意欲乘风破浪。

顺势而作为

民营企业的跨越式发展常常遇到瓶颈制约，难就难在“破”“立”之间的“度”的把握。突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打破旧机制，创立新机制；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协调发展的产业构架；破灭“家族式”的工作惰性，建立规范有序的现代企业制度；击破“我是老板”的狭隘“裙带观”，树立利益共同体的统筹发展观……这一“破”一“立”之间，学问大焉！

佛教上把无限的时间叫作“世”、无限的空间叫作“界”，这是构成这个世界的最基本元素。

做企业也一样讲究“时间”和“空间”的“世界”。

我是一个喜欢向前看的人，而往前走是需要计划做支撑的。不但心里要有计划，更要有实现计划的方案的谋略、勇气和决心。

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一个产业有一个产业的进化方向。我把自己对市场的理解、对产业的把握、对商性的领

悟融入“全丰”，不断在寻求企业发展的突破点，并引领全丰在注重食品安全与绿色理念、强化食品工业产品的同时，逐渐向“大健康”领域发展。我认为，“健康中国”不仅是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而且将是一种全民性的刚需。

为此，我一方面从内部入手，改革股权分配制度，将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开，一改股东分益、员工打工的传统模式，让更多的员工参与进来。“全丰”为大家搭建了一个事业的平台，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只要通过努力和坚持，都能在企业找到自身的价值，从而成就自我。我公司里的员工，大多都追随了“全丰”好多年。许多员工在这里工作长达十年之久，大家同甘共苦，共同经历和见证了公司的发展。正是这种“情感”，让“全丰”企业有了更为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另一方面我开始与各大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着手在沿海发达城市建立共享实验室，引领绿色健康产品向着更高层次、更高科技含量、追循市场终端需求的方向发展，旨在为“全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保障的同时，引领中小型食品工业向绿色健康产业转型升级。

我们将市场信息反馈于科研，我们用科研成果服务于产业。与其说这是一种责任，不如说是一种顺势而为的使命。

逆势而飞扬

世界管理大师熊彼特指出：所谓“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而“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组合”，实现“创新”。

2020年4月8日，武汉历经磨难之后，正式打开了暂时关闭的城市大门。我逆行归来，选择了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正式成立了湖北鑫全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我们开始投建集研发、办公、物流、仓储为一体的鑫全丰大楼，预计将于2023年建成。

我认为，做企业不能跟跑，跟跑注定没有出息，唯有领跑才有出路。从“万全”到“全丰”再到“鑫全丰”，从建立传统产业基地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造核心竞争力，从拓展绿色健康产业到对接市场科研、引领健康消费新趋向，现实和愿景一次次被重新定义和构架。我认为，在经历了一定的产业与经验积累后，要想长久注入品牌的活力，唯一能保持活力的，只有不断突破的创新。历经20余年的耕耘，“全丰”已经成为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食品原辅料供应商之一。而“鑫全丰”是一个思维更超前、市场更高端、模式更新颖，揉合现代化的大数据产业分析的站在绿色、健康产业链前端的后现代企业。

用创新的理念与观念、精神与文化、产品与服务来打造“鑫全丰”品牌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以市场拉动科技、以科技推动产业，乃至形成“鑫全丰”特色鲜明的核心竞争力，保持“鑫全丰”可持续健康发展，是我的远景梦想。

这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鑫全丰”已经脱离传统的本土市场，向着沿海、高校、大企业等集团客户进军，开拓全新的高端市场。同时，“鑫全丰”已经拥有一个集机构合作、团体合伙、团队合营的全新战略布局，做深、做细、做精、做透绿色健康产业，致力于以专业化下的多元化引领行业与产业发展为使命的“鑫全丰”理念，来自团队于对产业和行业的深刻理喻，也是来自于每一个“鑫全丰人”如流水般润物细无声的创新精神。

政策与商机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人品与人格对于决定企业家与企业的市场融合力至关重要。这不是成功的标准，却是成功的秘诀。

知恩而图报

古语有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万千浙商亘古不变的处世法则，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承袭与弘扬。收入不是衡量成功的标准，利益也不是权衡能力的杠



2019年蒋喜出席武汉市台州商会20周年庆典

杆。一个人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他对家庭、对事业、对社会的综合奉献上。

在武汉，浙江台州籍人士有十万左右，经营领域涉及工业、农业、金融、能源、科技、医药、教育、房地产、建筑、商贸、物流等诸多领域。武汉市台州商会成立于1999年6月，参会企业一千余家，安置了数十万人就业，年创税过亿元，为武汉和台州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很高兴有这么一个大家庭的陪伴。我这一路走来，离不开台州商会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商会，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能够连任三届武汉市台州商会秘书长，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些年，商会的凝聚力一直深深影响着我。商会的会长及前辈们教给了我很多为人处世及商业以外的“门道”——让我得以入“门”，并深深悟“道”。这些年，我不但得到了成长与历练，也学到新浙商的思维模式与思想方式。

对我来说，商会是一所学校，那里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传经送道、耳提面命，收获颇丰；商会是一个平台，现代信息与资讯建在这里交融汇聚、资源共享，收益良多；商会是一个家庭，乡音乡贤在这里相互勉励、同舟共济，温暖如馨；商会是一个舞台，精彩纷呈……身为秘书长的我，不管是支援革命老区还是援助贫困学校，不管扶助贫困党员还是援建灾区重建，从冰雪灾害到汶川地震、从支援家乡到防疫抗疫，都责无旁贷、义无反顾。我用自己方式汲取营养、茁壮成长，也用自己的方式乐于奉献、共助发展。我真心希望能在商会成员共同的努力，把武汉市台州商会这块牌子铸造得更响亮、更持久！

岁月如歌，生命如河。小溪哼着歌儿奔向大海，感恩着一路上的遇见。它遭遇过

巉岩险阻，也途经过平缓的滩涂。它在暴风雨中怒吼，也在晚霞余晖中舞蹈。终于有一天，它远远地望见了大海。

现在于我而言，虽然企业在不断做大，但骨子里还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小女子”，我在平衡股东利益与员工利益的同时，更得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关系。身为人母，就得有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身为儿女，就得有应有的孝心与敬畏；身为老板，你得有自己的担当与魅力。有人说，这很难，但我说，厚德才能载物，只要凡事用心、不亏不欠，用自己的正心、正言、正行的人格魅力去感知世界，这世界一定会给你善报与福报。

我记得，我的孩子们曾经问我，未来将会如何。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我很喜欢的故事，故事讲的是一朵在海洋里漂流了无数个春秋的小海浪，它享受着海风和空气带给它的欢乐。可是它突然发现，前面的海浪正在撞向海岸，顿时神情黯然。这时，另一朵海浪淡淡地笑着告诉小海浪，你不仅仅是海浪，还是大海的一部分，你的生命是属于大海的。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换个角度，就是另一条生命，另一种活法，另一番境界。

自强不息方显生命本色

◇ 柯于亮（口述） 谢定（整理）

人物名片：柯于亮，武汉黄石商会副会长、武汉阳新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柯亿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西湖区人大代表，东西湖区工商联副主席，武汉市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湖北省青年民营企业家联谊会常务理事，东西湖区年轻一代企业家联合会监事长。

“出门在外，要踏实、诚信，要不忘学习。”这是我17岁离家务工时母亲的叮嘱。“你还年轻，不要怕失败，失败了要认真分析原因，重新再来。”这是我21岁创业失败时母亲的鼓舞。母亲没读多少书，但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位“哲学家”，她将男儿当自强的朴素生活哲学刻进了我的生命，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去开天辟地，为理想去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我叫柯于亮，出生在阳新县的一个小山村，家里兄弟姐妹五个我排行老幺，小时候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爱学习会唱歌，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上大学，但生活就是这样让人猝不及防，突如其来的一场家庭变故打破了我原本平静的生活。我7岁那年父亲不幸溺水去世，接下来只能由母亲担负起抚养我们5个孩子的重担。那一刻我突然长大，放学回家自己做饭，周末帮着砍柴做农活，看到忙碌的母亲累弯了腰，就跑过去黏在她身边陪她聊天。我时常宽慰母亲说：不用担心，等我长大了就好了。慢慢地，我懂事了，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十年如一日地为家庭操劳，经常体力不

支晕倒。我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赚钱养家是我的当务之急，带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念头，1998年离开学校踏上了到武汉打工的路途。

我揣着仅有的100元钱启程了，这笔钱还是从姐姐那里借来的，为了省5块钱的车费，翻山越岭到县城坐夜班车买了站票，直到晚上才抵达武汉。车费花了15元，晚上舍不得住旅馆，发现公园的花坛不错，和衣躺了上去，行李当枕头，疲惫不堪的我顾不上嗡嗡作响的蚊子，沉沉的睡过去了。第二天到集贤路人才市场交了50元介绍费找工作，幸运的是当天我就找到了一份水电小工的工作，通知第二天上班，心里总算踏实了。两天没吃上饱饭的我，下午在路边摊花了8元钱炒了一份油淋茄子，饭管饱，那味道好极了，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一生中最美的味道。吃饱了边往上班的方向走边思考晚上住哪里，走着走着发现路边一辆废弃的麻木车，眼前一亮，晚上睡觉的地方有着落了。

第二天如期上岗，由于是试用期，担心做不好老板不要我，于是我倍加努力，钻下水道、拉电缆、脏活累活抢着干，很快得到了老板的认可提前转正。没过多久传来一位在北京开门窗厂的老乡要招收学徒的消息，我一想这个比卖苦力有出息，母亲那句“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俗语在我耳边响起，于是我毅然决定北上。

到北京后，我白天努力工作，晚上自学绘图设计，我从门窗、幕墙、装饰设计行



2020年，柯于亮（二排左六）带领员工参加团建活动

业的学徒开始做起。通过不断地刻苦学习和反复实践，用2年时间，我就掌握了精湛的专业技术，就连曾经在武汉打拼结识的朋友都听说我的专业能力不错，2001年他们邀请我去武汉承包工程做包工头，这于我而言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想到机会与挑战并存，就果断答应了。

2001年春天，我在江岸区后湖组建了一个小型门窗厂，当起了包工头。那两年确实很辛苦，以前只用专心干好活，大事有老板操心，现在什么事都得自己先往前冲，5+2、白加黑，风里来、雨里去，一人带十杂。本着要么不干，要干一定要干好的决心，我的业务越做越多，顺利的积攒了人生的第一桶金，更重要的是掌握了门窗行业的经营模式，为后面的创业打下了基础。

上天眷顾努力的人

2002年，门窗行业的洗牌来临，大批价格低廉、同质化严重、质量水平低下的门窗产品以及生产企业被市场淘汰。我的门

窗厂也受到影响，产品销售业绩直线下滑，再加上缺乏管理经验，企业内部矛盾加剧。2002年，我30多万元的启动资金全部亏空，刚刚组建才1年的门窗厂面临倒闭危机。

那段时间我很迷茫、消沉，这时母亲带着借来的2万元钱来到武汉，交到我手上，让我重新开始，并勉励我，男儿要皮实，要经得起摔打。这些话给我当头一棒，是啊，失败不可怕，被失败压垮才可怕。

拿着母亲借来的2万元和我四处拼凑的资金，我重新出发，分析行业现状，积极做调研，要想在行业中站稳脚，必须转型走高品质、多品类的高端门窗发展之路，并加强售后服务。此外，我还决定以门窗行业为基础，积极发展幕墙、钢结构、装潢、中空内置百叶等业务。

2003年3月，我正式创立武汉俊华时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那时我才21岁。一开始进城务工是打算赚到10万块钱回家娶个漂亮孝顺媳妇，让母亲高兴一下就好。没有任何背景的我，做梦也没想到可以开一家自己公司，所以倍加珍惜。



武汉阳新商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柯于亮

汉正街第一大道项目是我转型后的第一个业务。为了做好这个项目，我既是公司董事长，又是技术员，又是施工队长，几乎每天只睡3个小时，与工人日夜奋战在一线。由于过度疲惫，有一次在驾车赶往工地的途中，我发生车祸，受伤的我不顾疼痛，在医院简单包扎后又立即赶往工地施工，就为了按时按质完工。

我的诚信努力被甲方看在眼里，让我在行业内获得了良好的口碑，此后，我的业务越做越宽，发展越来越快。2010年，我成功对接了东西湖招商引资信息资源，投资建造了2万平方米花园式门窗幕墙生产基地。建成后的厂区生产规模在当时排在行业领先，每次客户前来考察都非常满意，接单容易了很多，也吸引了很多大客户，当年公司的产值就由上一年的3000万迅速提升到8000万。2015年，我们的产值规模达到了3亿多元，建筑幕墙年生产能力达30万平方米，建筑门窗年生产能力达50万平方米。成为建筑装饰行业领跑者，荣膺中国建筑装饰综合实力百强企业、中国建筑幕墙工程50强企业，连续十年被评为省市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并率先在行业内被认定为“湖北省著名商标”“武汉市著名商标”“高新技术企业”。

正所谓“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比你富有的人比你更爱学习”，创始人停止“进化”，是企业发展最大的障碍。尤其是我早早出来打拼，受过的正规教育有限，面对越发激烈的市场竞争，更是要加倍地去学习，提升思维认知、增长智慧格局。

自创业起，我始终保持着对学习的热忱，在北大清华总裁班、浙大商学院等院校深造，也参加各类国内外知名培训课程，系统学习了市场营销、财务税务、股权架构等

等，学习后运用到企业中去。同时我积极加入各商会协会，相信“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学习众多优秀企业家的商业智慧和为人处世之道，拓展了人脉，放大了格局，开阔了视野。

在创业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从只有一家武汉俊华时代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发展到一个有着四家子公司的综合型产业集团，其中两家是高新技术企业，一家新能源公司和一家建筑工程公司，业务板块涵盖光伏发电、新材料、建筑、市政、乡村振兴等，很多大工程项目里面都有我们公司的身影。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努力做好自己，为社会添砖加瓦，同时我也感恩我能身处在一个大好的时代，让我们这些从山沟沟里走出来的穷苦孩子，有谋生的机会，有创业的机会，有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机会。

走得再远也不要忘了来时的路

时常在梦中，我会回到17岁那年离开村口的路上，而背后就是母亲驻足的眺望。今年我刚好进入不惑之年，我常常思考，我的企业、我的财富应去往何方，想想来时的路，我找到了答案。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自立自强，离不开社会赋予的机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精神的应有之义。

作为湖北省十大杰出青年、十大杰出创业人物、十大诚信人物、优秀共产党员等，这些荣誉的背后更是一份责任和担当。在任东西湖区第九届政协委员时期，我一直很珍惜这个光荣的身份，积极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支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参加党政学习，走进革命根据地井冈山、西柏坡、延安等地学习革命精神和

崇高的理想信念，参加考察调研活动，积极建言献策，发表20多条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提出了《关于加强建筑消防市场监管的提案》等4份高质量的提案，加强本行业的改革升级、提升建筑防火市场的规范管理、为区域经济建设高质量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今，作为东西湖区第十一届人大代表，更要积极的参政议政，从思想上、格局上更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听党话、跟党走，在未来的履职路上迈步前行，取得更丰硕的成绩！

饮水思源，致富图报，公益情怀是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尤其是我自己生长在农村，经历过穷苦的生活，我更希望家乡的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年轻的下一代们能少走弯路、多读书。这些年来，我为“阳新济阳助学基金会”捐款累计达50万元，阳新对口捐资助学二十余名学生，为家乡木港镇枣园村扶贫事业累计捐款达60万元，汶川地震时带领公司团队捐款10万元，2020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累计捐款捐物10万余元。在公益事业这条路上，我越走越坚定，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抗洪抢险、对口帮扶、精准扶贫等累计捐款30多万元。

自强不息，奋斗不止，我会继续努力，脚踏实地创造美好生活！

谢定，武汉柯亿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

我要认真修好每一列地铁列车

◇ 张兵（口述） 白爱萍（整理）

清晨，冬日暖阳透过窗户照进武汉地铁常青车辆段运用库，在地面上留下斑驳光影。我带着4名学员登上一列地铁列车，一边巡视车内电气设备，一边给学员讲解电气设备维修要点。

这是我迎来新的一天的例行方式，我教得仔细，学员听得认真。

我叫张兵，是2021年湖北省“荆楚工匠”，现为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中心车辆二部电气钳工主任技师。

—

我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

我的职业生涯始终与列车为伴，前半截是组装车辆，后半段是拆修车辆上的各种电器设备。但无论在哪里，我30多年如一日，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终成技术“大拿”。

17岁那年，初中毕业的我入职武昌车辆厂。在那里我一做就是20年，先后获得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和“武汉市技术能手”称号。我曾凭借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车辆检修经验，带领80多名转岗员工在半年时间里完成30节冷藏车新造及1列军用冷藏车的改造任务，而这80多名员工中，只有我一人为车辆电工。当年，我还为东莞车辆段设计制作了3台车辆检修试验设备。

2006年，我通过应聘入职武汉地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电气系统检修工作。从此，我与地铁列车上的综合控制柜、照明灯、空调、电采暖等电器设施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列车的1000多颗螺丝、160个照明装置、120个电采暖装置、60个电力连接器、40个轴温报警装置、数万条线缆，陪伴着我走过了十多年的寒来暑往。

随着武汉地铁的快速发展，我处理大小故障上千起，排除车辆安全隐患不计其数，先后参与1号线、2号线、4号线的开通、

调试、运营。我还参与编制武汉地铁1号线一期车辆架修、2号线一期车辆架修及大修等车辆检修规程及工艺文件，并沿用至今。

二

在武汉地铁，我是检修“一把刀”，而这“一把刀”是我勤学苦练换来的。

入职之初的学历仅为初中，我正视自己的“短板”，自我加压，通过自考取得了大专学历，并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磨砺自己的技能水平。进入武汉地铁后，我逼迫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列车的“五脏六腑”都搞清楚，只要是厂家前来对列车进行维修，我就抓住一切机会“偷师学艺”，在现场该记的记，该问的问，从来不怕“掉底子”。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的维修技艺日臻娴熟，维修经验日益丰富。地铁每个部件“长得什么样”我了如指掌，每型车100张电气原理图，我随手就可以画出来，以前非要厂家来人才才能解决的种种“疑难杂症”，我可以“迎刃而解”。

武汉地铁的座椅设有电加热装置，每到冬天这个装置就会开启，为乘客提供舒适的乘车服务。每年10月份武汉地铁开始列车的“秋整”工作，2号线的列车整备工作完成，我都会一一把关，其中就包括要启动椅下的加热装置，从车的一头走向另一头，一张张座椅摸过去。只有复检通过，列车才可以进入运营。

2015年11月的一天，我按惯例摸到一列车的第三节车厢时，发现有一张座椅的温度有点高，坐上去后我确定自己的判断。

把同事叫过来试坐后，同事却觉得很正常。这下子我的犟脾气上来了，用设备一测，果然比正常值偏高了10℃左右。

我把加热设备关掉，等座椅温度降到跟环境温度一致后再次打开检查。这一冷却、一加热，多花了接近一个小时，我不怕麻烦，硬是把问题找了出来。原来电暖的温控器位置偏移了一点，导致没有在合理的温度自动停止加热。随后，我将这一情况反映给车间，要求对30辆列车进行普查，对类似情况进行全面整改。

我的徒弟们津津乐道的是另一件关于“0.1bar”的故事。

2016年，在给一列新进列车做试验时，徒弟们发现松掉制动后，仪表上还显示有0.1bar的压力。这意味着列车行驶时，闸瓦与车轮始终处于摩擦状态，就像汽车拉着手刹在行车。徒弟们怀疑是传感器故障，但后来排除了，他们又将这列列车的中继阀拆下，安装到另一辆列车上，发现问题也跟着跑来了，于是锁定为中继阀故障。

锁定了问题所在，徒弟们却迟迟找不到原因。半天时间过去了，再不修好就要影响正常运营前的正线调试。维修工班长打电



工作中的张兵

话给厂家，厂家建议：“让张兵师傅帮忙看一下！”于是徒弟找到我。

我细细检查了一番，丰富的维修经验告诉我，问题很可能出在中继阀的电磁阀上。于是我让几个徒弟把三个电磁阀拆下来检查。在拆到第二个的时候，我和徒弟们发现，这个电磁阀孔上覆盖着约0.5毫米厚的防尘膜，揭掉后再试，0.1bar的压力就消失了。

三

我热衷于创新。

空调控制器是地铁列车空调系统的核心模块，一旦出现故障，列车要马上返回场段接受检修。但是空调控制器为全进口，且原空调系统厂家售后团队解散无法提供技术支持，出现故障后只能购买新的控制器，价格昂贵，到货周期长。而且检修人员进行人工检测时，需对盒中8块板卡的数百个端口和接线一一排查，检测一个控制盒需要8小时以上，效率非常低。

“这样不行呀！”我很着急。和电子元器件打了30多年交道的我萌生了自己造一个模拟试验平台的想法，将人工检测“搬”到机器上。我拿着空调控制器进行反复研究，自主设计研发出“空调控制器模拟试验台”。该试验台是一台静态情况下的空调控制设备，在电脑中安装相应程序，通过集成相应继电器、执行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模拟出空调运行的各种状态，通过试验台的指示灯熄灭情况，快速精准锁定具体故障点。“空调控制器模拟试验台”将单件故障控制器的检测时间从8小时缩短至10分钟，不仅缩短工时，还减少了人工检测时多次插拔的损耗，极大提高了检修效率。

2020年下半年，我发现雨刷故障频现，

通过细致分析，我判定雨刷动作存在切轴情况，即主动轴断裂，是控制盒电器元件老化，控制电机停机位置不正确导致。雨刷控制盒处在相对狭窄的空间，拆装控制盒较为麻烦，为确保每次安装后的雨刷控制盒能够有效使用，我带领创新团队设计雨刷控制盒检验平台，确保装车后控制盒能控制雨刷摆动范围，避免切轴现象出现。这小小的一个试验平台为生产提供了大帮助，避免了反复调整、重复作业，提高了劳动效率。

这两个项目，只是我众多创新项目中的两朵小浪花，我认为创新是促进企业生产高效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将创新意识运用在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里。针对2号线正线出现司机室激活继电器故障导致清客退车事件，我在均衡修修程中加入“对车辆所有关键回路继电器和安全回路列车线进行预防排查”，并针对车辆VCU（车辆控制单元）、TCU（牵引控制单元）、ICU（逆变控制单元）故障数据记录与厂家技术人员探讨分析，提出了优化改进措施。根据行业发展趋势，我自主攻关轨道交通车辆专用电路板维修技术，研究将电路板故障件维修成本最小化，自行绘制10余件板卡电路图，实现自主更换故障元器件，所研发的轨道交通车辆各系统电路板维修技术开创了武汉地铁电路板自主维修先河，每年为公司节约维修及备品更换成本近百万。

2015年7月，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成立，工作室先后立项并完成创新项目20余项，累计节约维修成本超过200万元。我和团队设计、制作完成的制动电阻风机扇叶拆卸工装、闸瓦托臂调整杆螺母座拆卸工装、车辆牵引杆安装座辅助工装等一系列用于车辆维修的辅助工装在生产中起到了巨大作用；自主设计研制的辅助

逆变器风机试验台填补了专用风机实验设备的空白。工作室创新成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在车辆维修部门间推广运用。

四

如今的我，还带出了不少徒弟。

为帮助青年员工早日成才，助推武汉地铁高质量发展，我主动承担起“师徒带教”工作，利用业余时间自画列车电气原理图，编写培训教材，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学技能倾囊相授。

实践出真知，技术不是仅靠看书来习得的，更是通过实战来积累的。我时常带领徒弟一起钻研车辆检修技术，要求徒弟在实践中不懂就问，动脑动手用心琢磨。

一次带教过程中，徒弟陈奇志发现一列车的辅逆 H1 无法正常启动，在排查了所有可能故障点后故障原因依然没有找到，经验老到的供应商技术人员对此也一筹莫展。陈奇志无奈之下向我求助。我一遍遍回想辅助逆变系统工作原理、相关电路和在前期排查中可能遗漏的点，经过周密分析判断，我想到断开负载分段启动的方法，最终找出故障原因。

正是在我的言传身教之下，徒弟们业务水平和工作责任心得到了显著提升。强调业务技能的同时，我也注重培养徒弟们的创新意识。我认为培养创新人才需要从引导方式入手，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从要我解决问题转变为我要解决问题。

我还创新“全员讲师制”培训法，通过课下备课、PPT 授课、现场答疑方式让每名员工在生产空余时间轮流进行授课，既很好地促进了员工自学能力，又通过自身“备

课”和现场授课让员工业务水平和表达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多年来，我先后完成“传、帮、带”培训 320 余人次，培养 12 人成为班组长，其中 2 人取得技师职业资格，27 人成功晋级为高级工，夺得武汉市技能大赛车辆检修项目 10 余项荣誉。我的徒弟们大部分成为支撑武汉地铁车辆检修方面的骨干力量，他们业务技能扎实，工作业绩突出，在工作中传承着工匠精神，并在各自岗位发光发亮。

2021 年，我获评武汉市“带徒名师”荣誉称号。

五

做好列车电气设备维修工作，必须要有耐心和细心，但更重要的是责任心和钻研精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你就能成功。

在维修战线 30 多年，我奋斗不辍，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如“武汉市技术能手”“大城工匠”“荆楚工匠”等等。对于这些，我其实并不是很看重。我最高兴的事是看到一列列列车在自己的手中“手到病除”，重新上岗为广大乘客提供优质服务。

地铁是城市的动脉，列车安全关乎千千万万乘客的安全出行。我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我将用匠心促发展，以匠心致传承，用坚实步伐和朴实行动在轨道交通维修战线继续勇毅前行。

张兵，武汉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中心车辆二部电气钳工主任技师；白爱萍，武汉市总工会《武汉工运》编辑

和利冰厂与汉口城区的演进

◇ 侯红志

创办于1904年的英商和利冰厂，处在汉口开埠后外力入侵，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融碰撞的历史时期，其创建、发展轨迹与汉口城区的形成相伴相生、若隐若现。至今，和利冰厂、和利汽水厂旧址得以完整保存，是武汉工业遗产保护的一件幸事，也是汉口城区萌芽和形成的见证之一。

汉口老汽水肇始——和利冰厂

从1904年到2000年，一款名为“汽水”的夏季饮品，伴随武汉人度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追索现在名目繁多冷饮的源头，莫不带有“汽水”家族的“基因”。

汉口的汽水生产起始于何时，谁是“始作俑者”？检索武汉众多权威史料，是英国人开办的和利冰厂。《武汉通史》记载：“英商（和利冰厂）1904年开办，资本250000元，

业务为制冰冷藏。”和利冰厂后来派生了和利汽水厂，由于汽水生产环节与制冰有承接关系，和利冰厂应该是汉口老汽水之肇始。

在武汉地区出版的历史文献中，有关“和利”厂主的名字只有“柯三”二字；且没有任何“和利”老照片。从2013年至2017年，笔者4次面见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文科学院院长杰拉德·科赛恩教授，这位海外来客出示了十多张“柯三”当年的老照片，这位科赛恩教授竟然是“柯三”的嫡孙。“柯三”——这个在武汉史学界沿用了几十年的称呼，被教授要求译为科赛恩（Corsane），比对这两个发音，考虑到武汉人吐字快捷的习惯，当年，是否喝汽水的老武汉市民图简便，将科赛恩一带而过而读为了“柯三”，从而使其跻身正史流传至今？

和利冰厂创始人沃特·休斯·科赛恩（Walter Hughes Corsane），祖籍苏格兰，

生于1871年10月20日。1904年，他与同为中国轮船招商局安平号轮船上的工程师安德森，一起创办了和利冰厂，地址在今汉口岳飞街24—26号。现在，岳飞街44号被挂牌认定为和利冰厂，实际上是老科赛恩后来创办的和利汽水厂，这在杰拉德·科赛恩教授提供的很多老照片中可得到证实。

汉口陆地扩容催生“和利”

和利冰厂创办时，汉口开埠已有40多年，“和利”在汉口创业的历史背景与商业契机是如何凸显的呢？

据史料记载，汉口的冷饮制售始于1861年汉口开埠以后，由于大量外国人入住汉口租界开展贸易，形成居住群体具有商业需求而出现，其中，汉口夏季令人难耐的炎热气候是重要成因。

1835年，西方天主教遣使会的M.鲍达斯中文名安诺望，曾到达汉口和武昌，他写道：“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与巴黎一样多，它以商业和众多的船只而著称，这些船比法国所有港口的船只加起来还要多。”

在汉口开埠前20多年的1835年，武汉的外国人仅为少量的传教士。此后，外国人逐渐进入武汉进行贸易，但也数量有限，居住群落还未形成。老科赛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汉口时，“看到中国人把冰集中起来压紧，送到地窖储藏，存放到夏天用。”他从中看到了商机。1904年创办冰厂时，他们将轮船上的轮机作为动力源，进行机器制冰。

美国人罗威廉在他的《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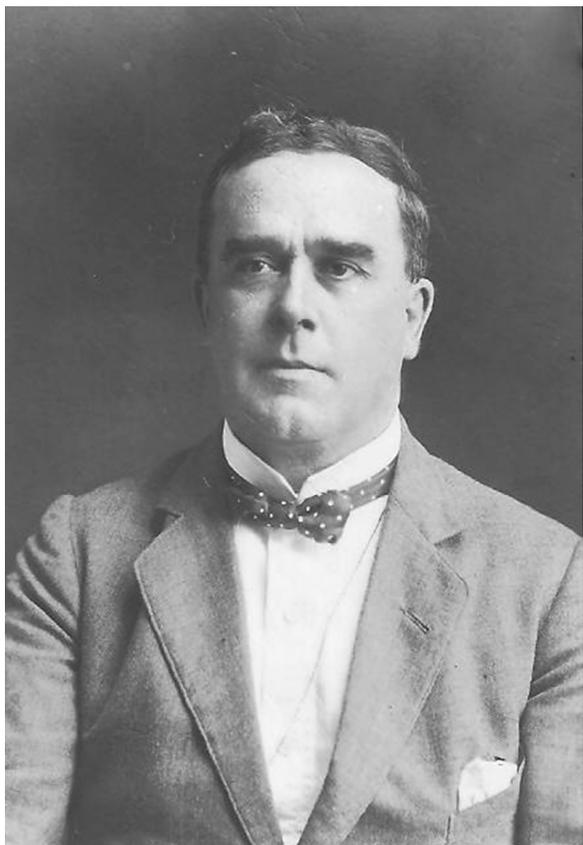
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写道：“在1864至1865年间（汉口开埠初期），外国人越来越倾向于将汉口看作一个商业前哨，而不是像上海和其他一些开放口岸那样，把它看作一个远离故土的家。”汉口的外国人之所以有这种感觉，与以下几个原因有关：“1861年汉口开埠，英国人在勘定租界时，忽略了租界地势比汉口旧市街还低，1870年的汉口大水及夏热冬寒的气候，使他们并不把这里当长居之地，而作为上海派出的一个商业基地。初期的汉口租界无论在物资上还是精神上都通过扬子江与上海紧密联系。”

汉口租界被洋人们看作“长居之地”，是在张之洞督鄂，于1904年主持修筑张公堤之后。其时，原汉口城堡外的大片地区露出水面，汉口陆地面积扩大了两倍多。

张公堤工程虽然对租界的直接影响不大，但随着城区面积的扩张，精明的洋商们显然嗅到了即将繁盛的商机，老科赛恩在这一时期创办和利冰厂，显然也是“闻”到了这股“气味”。老科赛恩和他的合伙人每年秋后轮番返英，购来新机器，使工厂由原



老楼房挂着和利汽水厂招牌



1904年创办和利冰厂时的科赛恩

来的一间小平房扩张到占地 800 多平方米的中型工厂。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和利冰厂已拥有日产 40 吨和 15 吨的氨气压缩机各一部，以及配套的制冰设备，冷库储存冰达到 1000 余吨，成为武汉当时最大的制冰工厂。

和利冰厂蒸蒸而上的时期，也是汉口租界日渐繁荣的时期。随着英、德、俄、法、日等国租界的设立，大批外国人在汉口沿江修建码头，设立仓库，开办洋行、工厂，租界内的外籍人口大量增加。在 1892 年，汉口租界的外籍人口有 45 户，外国人有 374 人；到了 1905 年，便增加到 114 户、2151 人。

洋人们在汉口租界内聚集或定居，带来的不仅仅是洋行和工厂，还有西方人的生活方式。1878 年，英国人在英租界阜昌街首先建立波罗馆，以满足英人业余时间的休

闲娱乐，此后，德、法、俄、日租界相继设立波罗馆。在波罗馆里泡酒吧、进弹子房，在界限街网球场打网球健身，是一种玩法；在马场赛马，在剧院看戏，也是一种玩法。在炎热的夏季，置身于公共空间休闲娱乐的洋人，需要摆脱热浪的肆虐，此前，洋人享用的汽水多由英国运来，随着需求的增加，造汽水，成为汉口租界商人们的另一个商机。

“和利”扩张的强心剂——汉口电灯公司

1906 年，汉口租界里另一件事的发生，使想投资造汽水的洋商进一步坚定了信心，这就是英商汉口电灯公司的开张。

1906 年 5 月，汉口的英国皮货商集资 3 万英镑，在吉祥街（今合作路）创办汉口电灯公司，装直流发电机 3 台，总容量 125 千瓦，9—10 月间开始向英、俄、法租界供电。

汉口租界的电流犹如一剂强心剂，使敏锐的洋商立即行动造汽水。史料记载，1918 年，英商赞育药房投资扩建赞育汽水厂，从英国运来了新机器机制汽水。由于汽水产量大增，需大量冰块，得从和利冰厂购来。老科赛恩一见这阵势，便决定“釜底抽薪”，自己开办汽水厂。于是，他在和利冰厂东侧购置一块土地，从英国购进全套制造汽水的新设备，在今岳飞街 44 号创建了“和利汽水厂”，其注册商标是一个有古宝塔城楼的圆形图案。

从此，和利汽水、赞育汽水充斥武汉三镇及邻近省份市场。《汉口租界志》记载，和利汽水厂筹建时间是 1918 年，1921 年投产。但科赛恩教授提供的两张家族老照片显示，其建成时间是 1917 年 3 月。

和利汽水厂初创时期，日产汽水最高

可达 2000 打，按照 1 打 12 瓶计算，可达 24000 瓶。资料显示，外国人在汉人数，1910 年 2 706 人、1928 年 3 996 人，1921 年前后在 2 500 人左右浮动，主要居住在汉口。而据 1913 汉口各警察署统计的有户人口数，汉口的华人总数为 229 976 人。虽然，和利汽水的主要享受对象是咖啡厅、跳舞场、跑马场的寻欢作乐者，以及餐馆、银行、海关和各国驻华领事馆的职员和官员。但是按照 2 万多瓶的日产量，汉口的中产人士和华人群体已经在大量享用汽水了。

“和利”做大的运输动脉——京汉铁路

和利冰厂 1904 年创立时选择了法租界，说明老科赛恩当时是青睐这里的，当年的法租界有什么吸引了这位英国船员？

1889 年，清廷动议修筑卢（京）汉铁路，到 1897 年才分别由河北、湖北两省分段动工，虽然直到 1906 年 4 月才全线接通，但此前的 1900 年，位于法租界附近的大智门火车站就已建成并开始客货运输。当 1904 年，老科赛恩在距离大智门车站一公里路左右的霞飞大将军街为和利冰厂选址时，显然对这座车站和这条铁路的远景有着深谋远虑的考量。后来，这位英国商人在为和利汽水厂选址时，也是在冰厂附近。

“和利”，取二人“和”气生财、合伙谋“利”之意。1921 年和利汽水厂建成投产时，全部机器设备出自英国曼切斯特机械厂。耗用的主要原料柠檬酸、起汽剂、糖精和各种香料，以及机器上的零配件、橡皮圈、过滤纸都是从英国买来。其他大路货原料，如硫酸、小苏打、白砂糖等，则在上海购买。英国著名的“布希”牌香精一直用到解放后的 1952 年。由于用料考究，汽水香

味纯正，质量始终如一，使“和利”获利颇丰。

“和利”长期从外埠和英国购物，除了走长江水运，法租界北部边缘的京汉铁路是重要的运输渠道。而且，“和利”的产品从快捷的铁路运输出去，使它的销售如虎添翼，都证明老科赛恩选址没有选错。

卢（京）汉铁路修筑时，汉口城门所在地，均成为与铁路垂直的交会点。随着汉口城堡的拆除，新的商业街道空间开始形成，而以铁路站房为核心的商业辐射形态日渐成型完善，从整体上改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格局。

铁路开通前，外埠走武汉主要是水路和驿道，运不了多少货物。武汉地处中部，为四川、陕西、河南、湖南、贵州、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湖北九省通衢，但经济上是个矮子。卢（京）汉铁路通车后，武汉对南北方面的经济吸引力大增。

此前，河南商人大多跑到天津做生意，铁路通车后，河南人南来入汉者剧增，致“汉



科赛恩夫妇在汉口

口与河南密接”。京汉铁路通车前，河南省郾城、周口一带货物主要经沙河、周家口输出镇江，通车后，则改由周家口至漯河由铁路输往汉口。

京汉铁路通车前，从北京运货到武昌，沿着古驿道要走 27 天，有了铁路后，普快 60 小时可以到，快车只需 36 小时，而且货运量也不可同日而语，比用畜力、人力运输高出千万倍。当时有统计说，汉口的商品流通总量迅速增加了 4 倍以上。

当年，大智门车站汉口五国租界中离法租界最近。卢汉铁路始建时，自 1901 年 5 月起，法国驻汉口领事便屡次要求展拓租界，欲将车站揽入租界之中，张之洞认为法国人“实欲揽我路权”，若法国人企图达成，则官民商旅、兵械粮饷将为外人所挟持。经多次拉锯式谈判，1902 年 11 月 12 日，清廷虽与法方签订了《汉口展拓法租界条款》，法租界向西扩展到了汉口城堡以外，但止步于距铁路 60 丈，大智门火车站始终未进入法租界。

尽管如此，由于法租界紧邻铁路，地处新的商业街道空间“打卡地”，人口迅速增多。1923 年法租界总人口为 5230 人，其中中国居民 4856 人，法国人 52 人；到了 1929 年底，中国人便增加到 8250 人，法国人也随之增至 144 人。至 20 世纪 30 年代，由于时局动荡，法租界更成为各国侨民，尤其是中国居民的重要聚居地。1937 年底，入居法租界的中国人达到 2907 户、22651 人。在玛领事街（今车站路）一带，大量的旅馆在此落脚，玛领事街左右的长清里、辅堂里、永贵里、如寿里则是聚集娼妓的地方，另外，天声街一带集中了大批烟馆、茶馆，这里也有很多是娼妓的“暗门子”。法租界畸形的繁荣也给汽水制造商们提供了极大的市场。

1938 年，日军侵入华中地区，当地的中国政府机关及普通商民、外侨等都将法租界视作为安全的避乱所，纷纷迁入界内。到日军侵占武汉后的 1938 年底，中国居民更是增加到 47081 人。武汉沦陷后，法租界成为难民避难的“孤岛”，其间因进行区域自我封闭，一度极端缺水，老科赛恩利用有利条件向难民供水，以解燃眉之急。

老科赛恩的义举并未给他带来好运。1939 年 10 月后，他被日军带走送往上海，关进了日军设在上海龙华的“交战国非战斗人员”集中营，直至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此后，他回到武汉，与妻子继续经营和利冰厂。后来，他在街头被一辆美国人的汽车撞到头部，处于瘫痪状态，家人将他送回英国皇家属地泽西岛，与儿孙们住在一起。1950 年，沃特·休斯·科赛恩在泽西岛去世，享年 79 岁。

抗战胜利后，和利汽水厂卖给华商刘耀堂经营，解放后改制成为国营武汉饮料二厂；和利冰厂于 1950 年歇业。

侯红志，原武汉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对乾隆钦定“盘龙城”的史实梳理

◇ 裴高才

2021年10月18日，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发布“百年百大考古发现”，武汉盘龙城遗址入选。

盘龙城的名字到底因何而来，它在国家正史中真的“乏载”了吗？笔者就此查证明清时期的地理史志、方志、民间谱牒，以及军用地图等多重原始档案，阐发“盘龙城”缘何取代“盘土城”的始末。

“盘土城”源自一幅民国地图

为撰述《武汉城市史》（黄陂卷），笔者查阅了一批国家与地方史料，终于从《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乾隆、嘉庆两位皇帝钦定的国家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上，惊奇地发现一行小字：“盘龙城在（黄陂）县西五十里。”于是迅速拍照分享给诸位方家，受到著名文化史学家冯天瑜、严昌洪二公，及《武汉城市史》分区卷总主编涂文学教授的一致首肯，他们赞曰：“这是盘龙城研究颇有价值、重要的发现！”同时，正在盘龙城联合考古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考古专家李永迪亦云：“这标志着盘龙城名称之争正式成为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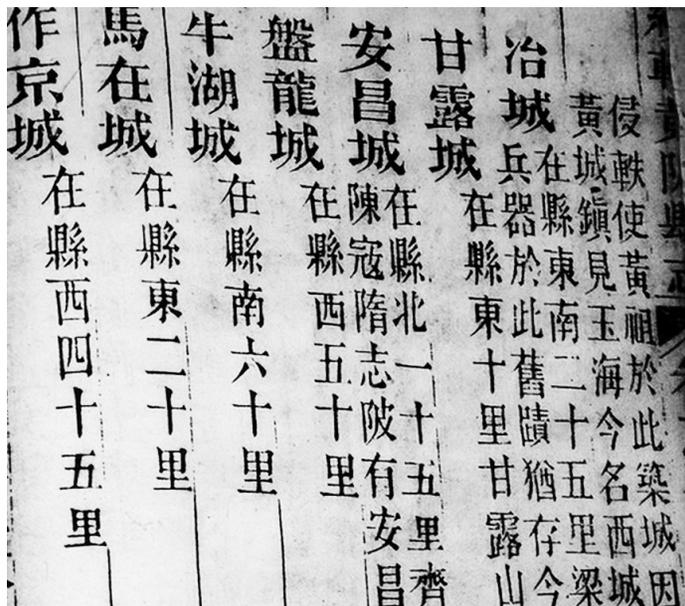
其实，盘龙城被发现之初的8年间，一度称之“盘土城”。它在地下沉睡三千多载，是1954年在武汉防汛起土时意外被“唤醒”的。那时，“发现盘龙城第一人”蓝蔚受命进行灾后文物普查，面对盘龙城处的一批文物，从一张1932年版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实测的1:50000军用地图上，发现标有“盘土城”及其城墙的标志符号。于是，他与同事游少奇按图索骥，骑车来到武汉市郊黄陂县南的盘土城实地踏勘。经过步测城墙、绘制草图、拍照和文字记录等，凭着一定的专业眼光，他们初步判断遗址属殷商时期城址。因当时尚未查到有关盘龙城的史料，故在1954—1962年间，文物部门均称之为“盘土城”，意即“城是土筑，其形为方盘”。

发现“盘土城”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湖北省博物馆等机构的张云鹏、俞伟超、李伯谦、李学勤、王劲、邹衡诸多著名考古专家，自1963起到此进行了四次大型发掘，以及考察与研究。1975年4月9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公开发表《盘龙城——长江中游商代城址的新发现》一文，令世人惊叹不已：这是一座商代早期的城址，还有大型宫殿建筑基址

呈现出“前朝后寝”式格局……从而打破了长江流域不在商文化范围之内传统观点。

盘龙城创造的青铜文化异彩纷呈，彪炳千古。在出土的3000余件文物中，通高85厘米、口径55厘米的青铜圆腹大圆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商代前期青铜圆鼎；通高41.4厘米、刃宽26.7厘米的青铜钺，是目前所见商代前期最大的青铜钺；文物极品、94厘米长的大玉戈，则是当时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我国青铜发展史上最早的铜簋，中原文化系统中年代最早、器形明确的金器——金片绿松石镶嵌龙形器，则是“盘龙”的实物证据。

盘龙城是迄今发现可以与河南安阳古城媲美的我国第二大古城，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英国牛津大学的东方学知名教授罗森夫人、美国哈佛大学考古系主任张光等纷纷前来盘龙城探幽。笔者赴台北故宫交流时，接待人员听说我来自盘龙城地区，惊叹之余不断打听盘龙城的前世今生。



明嘉靖三十五年、清康熙、同治年间《黄陂县志》均载“盘龙城在县西（南）五十里”

明清谱牒史料初见端倪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也承载了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文字，有相当一部分起源于原始的象形图案，所以早在甲骨文中便不乏象形地名之例。通观中国地名的命名，包括方位、形态、事态、山水、人物等多种命名方法，那么这座古城遗址到底是叫“盘土城”，还是“盘龙城”呢？

笔者经过一番探究，认为那张民国地图标识的盘土城名称并不准确。因为商代的城池均为土城，仅称土城不能彰显盘龙城的形胜。而该城址由盘龙湖三面环抱，犹一弯皓月抱蛟龙，龙以水生，相得益彰，依湖定名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那张地图只是孤证，不足以采信。这也许就是自1963年起，专家们将“盘土城”更名为“盘龙城”之故吧？在当时尚未查到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如此定名“盘龙城”，即是遵循徐霞客地名命名的“以形”“形象”“象形”原则。

其后，笔者梳理了河南安阳发掘的甲骨文卜辞的历史碎片，披阅了《诗经》名篇《商颂·殷武》等典籍，再结合中华民族龙凤图腾文化等因素，认为命名“盘龙城”，符合人与事、形与水诸方面因素，还与崇尚龙凤图腾的商王武丁、妇好夫妇南征荆楚息息相关。如果上面所说只是推理的话，那么笔者会同著名史学家皮明庥、严昌洪诸公经过查阅官民原始文献史料，则完全证实了“盘龙说”的准确无误。我不禁感叹：古今文士可谓神交千载，灵犀相通！

最早查证史料记载“盘龙城”者

是皮明麻先生。皮公在《武汉通史》中写道，最早图文并茂地描述盘龙城见之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黄陂《张氏宗谱》。《张氏宗谱》云：“宋元鼎革之际，吾祖德一公携弟国四公，由江右饶州余干迁徙楚黄陂，落住陂南盘龙城。”在张氏家谱上，还附有一张地形图，详细地描绘有盘龙城的四个城门，以及东边的盘龙湖和西北的护城山。笔者在2009年版《无陂不成镇》初版中也沿用了此说。

事后，笔者觉得《礼记》中的“九州之图，掌于地官”，可谓“八字真言”。这里的“地官”是古代官名，地官以司徒为长官，属下各官有乡师、乡老、乡大夫、遂人、遂师、遂大夫等。按照今天的话说，一国之正史，来源于中央与地方主持编纂的人文地理与方志史料，或出自熟悉地方文史的长官与专家学者之手。

我们从中得到启示：既然张氏宗谱中称，盘龙城在宋末元初即有图文记载，想必古代的《黄陂县志》也应有记载。经爬梳现存最早的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版《黄陂县志》后，果然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们在2016年草成的新版《无陂不成镇》一书中首次系统披露：最早标明盘龙城者，出自460年前的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黄陂县志》卷上之《山川·名迹》篇。上面赫然写道：“甘露城：在县东十里甘露山上。盘龙城：在县西五十里……”这比皮公生前查证的史料提前了312年。清康熙五年（1666年）、同治十年（1871年）版《黄陂县志》亦沿用嘉靖志之说。著名史学家严昌洪在新著《武汉历史文化概貌》一书中，也介绍了同治版《黄陂县志》载有“盘龙城”。

爬梳从盘龙城地区走出的清末民初国

学大师刘凤章（1865—1935年）编纂的《刘氏宗谱》发现，里面辑录了一份清嘉庆九年（1804年）的《盘龙城坟山来龙契约》，这比《张氏宗谱》的记述要早64年。素好文史的刘松余续修刘氏宗谱时，重录了原谱的图文。即宗谱卷首的《里居图》采用五万分之一比例描绘，地域在东经 $114^{\circ} 7' \sim 114^{\circ} 18'$ 、北纬 $30^{\circ} 30' \sim 30^{\circ} 40'$ ，地名于“盘龙湖”西标注有“盘龙城”；《祖墓图》则描述道，黄陂刘氏第十三世祖刘阳光与王氏夫妇葬于下新集之南、“盘龙湖”东侧的岗地；又辑录清嘉庆九年（1804年）《盘龙城坟山来龙契约》，记载了黄陂刘氏第十四世祖刘五魁与鲁氏夫妇葬于“盘龙湖”西侧墓葬图，墓地西北绘有“盘龙城”城址，城厢轮廓清晰勾画，四个城门清楚标示。城北杨宅、城西甲宝山等周围景地均有绘注。

刘凤章素以治学严谨享誉中外。而刘氏一族迁陂可追溯到明洪武二年（1369年）黄陂县令的刘拱宸，其子孙在盘龙城地区居住了640载。且《刘氏宗谱》的序言又是清代嘉庆六年文榜眼、湖南学政、浙江巡抚刘彬士所写，颇具权威性。我到台北故宫查阅刘彬士原始档案时，也发现了此序文。序中云：“守中先生，自明初宰陂邑入陂籍，善政炳炳勒于石，遗事煌煌载于志，子孙蕃昌，科名相继，诚为西陵巨族。”

无独有偶，从黄陂武湖高车碾旗杆湾走出的萧伯符教授提供的《萧氏宗谱》，清嘉庆戊寅（1818年）创修、光绪十二年（1886年）续修，亦载有盘龙城。其中，萧辅臣、萧良均等编纂，黄冈李耀兵木活字本光绪十二年《萧氏宗谱·续刊谱序》云：始迁祖、元至正进士萧武善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自江西吉水瓦屑墩“迁楚历二十一世。传始

祖居冈邑（黄冈）中和乡沙洲口，旋分徙陂（黄陂）南盘龙城及滢口，终定居（黄陂武湖）高车畈”。还有其六世祖萧廷柯归葬盘龙城的记载。

旧时墓地的选址，颇讲究风水。刘氏是明代湖广名宦，萧氏于元、明、清三朝走出了8位进士，他们均将墓地选于盘龙城，足见那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近代地图标明城形态

历史地图是展现前人活动与地理空间结合的重要史料，尤其是近代城市地图，乃是我国历史图像文献中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我们在查阅湖北历代地图发现：在清末民初的军用地图上，均标明了“盘龙城”。

首先是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一张《武汉略图》上，清楚地标出了盘龙城高地。这幅地图是张之洞督鄂期间，由湖北省常备军第一镇（师）工兵营制作，是迄今发现最早、最具权威的武汉地图之一，也是湖北省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圆锥投影，以“米”为长度单位和等高线表示地貌等近代西方测绘方法绘制的地形图。

武汉图书馆馆员王钢查证，1935年的湖北省陆地测量局实测绘制的武汉地图，也标明了盘龙城与盘龙湖的具体方位与形态。而且，擅长搞调查研究的日本人，其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也详尽地标明了“盘龙城”形态。

上述地图均是采用投影技术测制的城市平面图，其图式、内容和地物描绘的精确度，与我国传统绘画式古地图全然不同，相当准确地表现了盘龙古城在近代化之前的真实形态。换句话说，清末民初的行政当局，已经将盘龙城纳入大武汉版图。

乾隆、嘉庆钦定“盘龙城”

戊戌年夏秋之交，应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院长涂文学教授之邀，笔者开始参与编纂《武汉城市史》，拟将“盘龙城”在《武汉城市史》（黄陂卷）中单列一章。此间，正好湖南《书屋》杂志刘文华主编告知，《大清一统志》似载有“盘龙城”。按照黄陂县的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明代时黄陂隶属于黄州府，自清雍正七年（1729年）后改属汉阳府，我为此查阅了《大明一统志》之“黄州府”，以及《钦定四库全书·史部》之《钦定大清一统志》乾隆五十五年版第二百六十一卷的“汉阳府·古迹”篇。起初，笔者只是凭借以往查阅其他史料标识古城的经验，仅仅浏览了大号字所列的古城名称，诸如黄陂的“南司州古城、甘露城”等，没有发现“盘龙城”。再看《四部丛刊续编史部》之《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三百三十八“汉阳府”的“古迹”篇，同样未见“盘龙城”的字样。

窃以为，明代“一统志”只有九十卷，相对于乾隆“一统志”洋洋四五百卷而言，没有记载“盘龙城”情有可原，怎么清代“一统志”也没有记载？于是，我再次对“古迹”篇目进行逐字逐句查阅，终于在2018年10月19日深夜，于乾隆与嘉庆两个版本的清代“一统志”中发现了“盘龙城”的踪影！原来，“盘龙城、牛湖城、作京城”等古城没有单列，均是以小号字“隐藏”于大号字的“甘露城”之下。文中写道：“甘露城：在黄陂县东十里甘露山上；又，牛湖城在县南六十里牛湖湖……盘龙城在县西五十里，建置俱未详。”

对此发现，武汉文史大家给予高度评

价，其中盘龙城博物院院长万琳也称许说：“为探究盘龙城的来龙去脉，爬梳古籍，为盘龙城正名做了开创性的工作，非常感谢！”

众方家之所以如此重视这一发现，是因为《大清一统志》作为清代官方主修的国家地理总志，是清朝最重要的国家地理类文献。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五朝皇帝钦命，三次组织全国18个行省的力量编写，形成了康熙初修（342卷）、乾隆二修（420卷）、嘉庆三修（560卷）三部卷帙浩繁、不同版本的国家大典——《大清一统志》。之所以康熙、雍正两位皇帝在任上未能成书，是因为当时不少省的通志馆提供的资料残缺不全，需要进一步查证完善，以致自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钦命初修的《大清一统志》，历雍正朝，延宕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成书；二修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修成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式上呈，次年刊行。这样一来，在乾隆时期就出版了两部《一统志》。乾隆在《御制大一统志序》中写道：“康熙皇帝命修全国总志，‘以昭大一统之盛’，因卷帙浩繁，久未成书。雍正皇帝继命编纂总志，经十余年，次第告竣。”“自京畿达于四裔，为省十有八，统府州县千六百有奇，外藩五十有七，朝贡之国三十有一。”

那么，《大明一统志》为何没有记载“盘龙城”呢？这是因为全国一统志的史料来源于各省、府、县，然后由统编者进行筛选、审订，汇编而成。早在汉武帝时，朝廷就命地方官把记载山川、物产、贡赋等情况的资料，时称“地志”，随“计书”（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一同报送中央。

再看看乾隆与嘉庆“一统志”记载的

“盘龙城”内容，同明、清《黄陂县志》一字不差，可窥见一斑。而《大明一统志》成书于天顺五年（1461年）五月，极有可能是当时的黄州府与黄陂县没有层层上报“盘龙城”的史料，故而没有收入。因为迄今发现《黄陂县志》的最早版本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即在《大明一统志》刊行了近百年才编纂印行，《大明一统志》当然没有记载“盘龙城”。此后的清康熙五年（1666年）版《黄陂县志》沿用嘉靖志的记述，故乾隆、嘉庆版《大清一统志》即有“盘龙城”的内容。

一言以蔽之，从明朝到民国时期，国家大典、地方县志、民间谱牒、军用地图，以及发掘的文物实物等多重证据表明：盘龙城的名称自古以来昭然若揭，毋庸置疑。正所谓：家族有谱，县之有志，方国之有史也。

“模范夫妻”兴“龙城”

有人不禁要问：“盘龙城”缘何称之为“龙城”？窃以为，从河南安阳发掘的甲骨文卜辞的历史碎片、《诗经》名篇中，以及中华民族龙凤图腾文化，再综合人与事、形与水诸方面因素，可发现其端倪。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最早的诗歌总集，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颂》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商颂·殷武》即是商代后裔祭祀、歌颂殷商国王（高宗）武丁的功绩的乐章。诗中第一章的前两节“挾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表现了武丁对包括盘龙城在内的荆楚用兵的勇猛神速，所向披靡。后一节的“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则点明武丁征服荆楚之动因：继承成汤一统大业的历史责任。

武丁是殷商时期的国王，他在位 59 年，创造了商代中兴神话，身后庙号“高宗”。他的伯父盘庚、父亲小乙是他的前两任商王，其中盘庚即是殷商盛世的缔造者。商代实行的是方国制度。所谓“方国制度”，就是以商王国为中心，与周围其他方国组成联盟或联合体形成大的国家的体制。这就是《诗·大雅·大明》所说的“厥德不回，以受方国”。从盘龙城发掘的铜器、铁器与玉器等各类戈、钺表明，这里曾是以军人占主导地位的方国——戈城，因甲骨文中“戈”“我”通用，军人军事之意，而“钺”则是军队统帅。

考古及史家认定，早期的盘龙城即是商王盘庚及其前任商王震慑南方的军事城堡——“戈城”或“我城”或“我国”。有盘龙城李家嘴发掘的大型奴隶主墓为证：该墓除殉人三具，殉葬青铜器、玉器和陶器近百件外，还有一具大铜斧钺。斧钺是军事统帅的象征，史家由此推断此墓主即是戈城的最高统帅“钺”。随着天长日久，作为长江中游的方国——戈城羽翼丰满，戈城的戈族统帅钺开始割据南方。而到了小乙任上，商代式微，钺便公开宣布独立，脱离商王的统治。此乃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毛诗传笺》中所说的“殷道衰而楚人叛”。

武丁夫妇南下平叛，通过对荆楚臣民恩威并重，终使南北化干戈为玉帛。有《商颂·殷武》第二章为证：“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随着《诗经》的广为流传，以及殷商甲骨文的发现，“模范夫妻”商王武丁与妇好伉俪，南下扩建盘龙城，以及恩威并重地治理南乡的故事不脛而走。同时，武丁伉俪将盘龙湖打造成盘龙古城的生命线。

在古代，交通主要靠水路，而盘龙城正好通过盘龙湖沟通江河，成为我国联通南北、纵横东西的“九省通衢”。从这里出发，通过古代黄金水道府河及其湖北黄陂境内的干流淝水、漂水，穿越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往北可直达商朝王都郑州；又可出长江，入汉水、沮水，淌过随枣走廊，跨越南阳盆地，通往关中地区；往西亦可通过长江、汉江抵达巴蜀；往南则直达江汉，并借洞庭湖、鄱阳湖及其干流通往江南诸省；东乘长江一泻千里，又可沟通吴会，通江达海。正是这一优势，加之面对着广袤富庶的江汉平原，盘龙城这座商代长江流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便应运而生。

城市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盘龙城作为商王朝重要的青铜冶炼与铸造基地，成为“长江流域青铜文明之源”，在中国商史和商代文化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盘龙城遗址继 1988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2001 年 5 月入选《20 世纪中国考古大发现 100 项》。2017 年 12 月 2 日，“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则被国家文物局列为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综上所述，盘龙城的名称、史实与实物相互印证，清楚明了，毋庸置疑。同时表明：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随着盘龙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区的建成开放，武汉、湖北乃至长江流域文化建设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裴高才，武汉市黄陂区委统战部原调研员

湖北模范监狱幸存武船老厂区

◇ 韩少斌 罗时汉

武昌造船厂进行整体拆迁，其周边民居也正在腾退，湖北省城模范监狱旧址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人文武汉”团队最近对此进行踏访，并作了新的考证，以期促动其列入文保单位和历史建筑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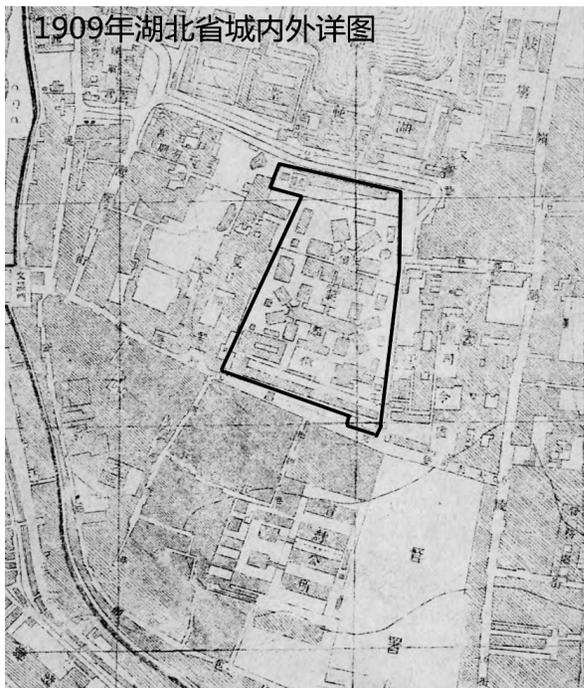
张之洞对监狱改良的贡献

监狱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由来以久。清末洋务运动中，随着西方文明和民主思想的传入，清廷高层及思想活跃的督抚要员，也开始注重对中国沿袭下来的刑法予以改良，如取消一些酷刑，并对在押的犯人给予较为人道的待遇。清光绪十六年，刑部曾责令各地督抚对关押的犯人安排学习一些手艺，或安置作杂役。光绪二十七年推行“新政”以后，要求各省改置新监，各省因财力

风气不同，并不能普遍推行。其中湖北、奉天两省试办模范监狱，经营较早。

晚清重臣湖广总督张之洞，对近代中国监狱改良贡献重大。鄂省当时吏治黑暗，官吏滥用非刑，民常以微罪入狱，且久不结案，不死于罪而死于久囚于狱。《张文襄公治鄂记》中说：“滥押久繫，为虐政之一大端，或疾疫凌虐，日久痠弊，或废业糜费，因而破家，此虽无杀人之迹，亦与杀人无异。言之痛绝。”他认为“此为关系民命之实际，若因陋就简，终无大益。省会领袖，尚不完善，支郡小城，安望合格。”“管理之法，虽在禁锢之中，而处处皆施以矜悯之方，並实以教诲之事，以为通省模范。”还应该“禁讼累、省文法、省刑责、重众证、修监羈、教工艺、恤相验、改罚缓和派专官。”

1904年，张之洞下发《札臬司飭各属



模范监狱在武昌的位置

清厘庶狱建设迁善习艺所并严禁滥刑》，责令鄂省地方官对重罪者“设法体恤”。罪不及死者“早日议结”；对“屡犯不悛，难于开除者，亦宜选择宽敞地基，建设迁善习艺所，选匠教习，振其懒惰之心，予以自新之路”。张之洞先派人去日本参观，“兼采东西各国，仍体察中国情势之能行者，量为试办。”并在江夏县衙东侧“购买民地，酌拟图式建造”，新造一所高规格的监狱。

模范监狱的规模与布局

张之洞筹资扩充改建武昌文昌门内路北的原武昌江夏县监狱，称湖北省城模范监狱。1905年动工，1907年竣工建成。此时，张之洞虽离任赴京，其一手倡建的这座监狱采用西式监狱的模式来管理和改造囚犯，成为清末监狱改革的标杆。湖北省城模范监狱的创办，早于奉天、京师模范监狱，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监狱。

模范监狱南北向深55丈，东西向前宽44.5丈、中间宽32丈、后宽21丈。中间有房屋、围墙隔断，分为内外两监。内监为定罪犯，约可容100人；外监为未定罪犯，约可容300人。外监西南角还设有女监，约可容40人；东南角设有病监，约可容50人。各监区厨房、厕所、浴室、工厂俱全，另还有医室、尸室、罪犯衣物室、教诲楼和各类办公、守卫、仓库等房。监外西北隅建有发电、抽水、锅炉房工作间及储水台。监内安装有电灯、电铃、水管、消防等设施。犯人可在监狱工厂学习织布、裁缝、编织草竹器物、制作文化用品等技艺。

又据1919年《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录要》记载，模范监狱分内、东、西、女、病五监。内监仿日本东京监狱，东西监仿日本巢鸭监狱，皆成扇面分列。西南为女监，东南为病监，中为办公区，表门北为行刑场。内监分道德齐礼四号，道、礼各二十间为独居房，德、齐各十二间为杂居房，定囚百人。东、西监各五所，共一百十二间。东编为“必也使无讼”五号，西编为“监于兹祥刑”五号，均为昼作工，夜杂居，定囚一百五十人。女监房十五，定囚四十人。病监房十六，传染病室七间，定囚五十人。监外有四栋职员宿舍，以及电灯、机器、锅炉等厂房。设织布、靴鞋、木工、鞭筒、裁缝、雨伞、印刷、制药、建筑、种植等作业科，在狱内教囚犯习艺。

第一批人犯中有革命党人

当年崭新的模范监狱开始行使专政功能，羁押的第一批人犯，竟是史称“丙午之狱”中的革命党人。

1906年12月，萍乡的矿工、浏阳的会党和醴陵的兵勇等借灾荒发动起义。这次

武装起义得到湖北日知会的积极响应。1906年底农历丙午冬腊，刘静庵、季雨霖、梁钟汉、张难先等“知音”相聚于汉阳伯牙台（即古琴台），提出加大运动新军力度、进一步筹措资金应援萍浏醴起义的方案。不久，萍浏醴起义遭到镇压的消息就从“鄂督张札臬司文”传布开来，武昌、汉口、汉阳的显要处都张贴着那白纸黑字的悬赏通缉告示。由于叛徒出卖，日知会遭到土崩瓦解，一个多星期内有9人被清廷逮捕，酿成著名的“丙午之狱”。

据《城市英雄——武昌首义世纪读本》所载，李亚东被捕后，被判刑五年，转禁汉阳；吴贡三在狱中关押了三年才被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刷印逆书兼编纂”；胡瑛被判处永远监禁；梁钟汉被判刑三年，发交原籍汉川县监禁；武昌首义之后，这四人得以出狱。季雨霖在候审所受到严刑逼供，大腿根部及臀部被打烂，后被黎元洪等作保出狱就医；张难先在狱中感染风寒，头痛难忍，狱医无治。公益社彭养光，联系沔阳同乡会黄福、王邵恂等出面，具名保他出狱就医。

在模范监狱，朱子龙、殷子衡和刘静庵所受酷刑最为惨烈。朱子龙又患血痢不止不幸死于狱中；殷子衡在老家黄冈县团风镇被捕押回省城武昌，收押在武昌候审所，

后又改押至江夏县狱。在被正式宣判后，又从湖北模范监狱转往夏口礼智司监狱。武昌首义几天后，殷子衡才率领难友们冲出了牢房。清吏对刘静庵组织会审，终至使用毒刑，鞭至一千四百下，肉尽见骨。1908年的《南方报》指出，“鄂省官场，近接湘电，称萍醴匪首刘家运在常德牛家塘地方缉获，去岁所捕刘静庵，指为刘家运，显系邀功冒赏。”刘静庵至死不松一口，如此坚贞不屈，被难友们誉为“铁汉”，被同志们誉为“革命完人”，被教友们誉为“活着的耶稣”。武昌起义爆发三个月前的6月12日，刘静庵因伤重而病逝狱中，年仅37岁。胡兰亭为刘静庵收殓，将其葬在武昌伏虎山麓。

此后，被誉为中共隐秘战线“潜龙”、曾任武汉市副市长的汉阳蓼山人张执一。1932年10月任中共武汉特委委员兼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时，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1月从军人监狱转押到当时的武昌第一监狱，后转入湖北反省院，在此关押过一年半。在狱中，他化名张忍，“哪怕牺牲自我，也要坚持斗争到底，执一不二！”出狱后便改名执一。他曾撰文回忆其在模范监狱时收押在西监，在鞋工厂记账，后到病监，一直利用与同监有限的接触，暗中宣传，进行斗争。



模范监狱整体

中国第一座近代监狱

模范监狱与武昌红楼是同时期的建筑，曾使用于清末、民国、日伪时期，充当着不同政权的专政工具。模范监狱从初定的关押数百人到曾关押二千余人。其中不乏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如大革命失败后，就有杨献珍等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关押于此。

模范监狱历经变更。1913年改称湖北武昌监狱。1917年更名湖北第一监狱，属甲类新监，由省高等法院管辖。国民政府时期，改称湖北第一模范监狱。1936年又改为武昌湖北第一监狱。抗战时期西撤宜昌为湖北第三监狱、恩施建始县监狱，后迁建始朝阳观三清洞。日伪将武昌旧监房改为国军俘虏收容所。1946年湖北第一监狱迁回武昌原址。1949年5月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接管，称武昌监狱。后移交省公安厅，又改称湖北第一监狱。1958年房屋移交武昌造船厂。

最近，“人文武汉”团队经现场观察模范监狱现存房屋的风格、形制、结构，在周边高层楼房拍摄比对，并与1919年以前监狱平面图、1909年老地图、卫星图综合判断。可初步认定模范监狱现存房屋应不少于11栋，分别是东监四栋、物品库，第一、二、三织布科和靴鞋科，以及内监道、礼两号独居监房。其中，内监一栋恐因失火等原因，屋顶已只剩残破框架。所谓女监恐早已不在。

历经一百余年，现在的原模范监狱房屋虽经加层、改建或部分拆除，但大部分尚存，有的监房钢栅栏还是原物。现场得知，



模范监狱局部

那四栋监房围着一栋房的扇形布局，俗称“王八楼”，监房分别叫作“有、过、必、改”（或“天、地、玄、黄”及“甲、乙、丙、丁”），这是旧时监狱的典型布局和称呼。

专家们认为，湖北省城模范监狱是中国第一座近代监狱，是张之洞湖北新政的重要遗存，也是近代狱政改革、监狱变迁与发展的重要见证。同时，还是辛亥志士的殉难地、革命先烈的斗争场，承载着许多历史事件，是武汉城市不可缺失的文化载体。保留和保护它，在建设武昌千年古城的今天，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湖北模范监狱这样的清代监狱可能是国内仅存的，十分宝贵。期待有关部门再次对该建筑群进行勘测、认定，尽可能将其纳入文物保护单位。其周边人文环境如湖广总督署墙都应予以保留。

韩少斌，武汉奥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理；罗时汉，长江日报社主任编辑